

**坚决肅清龔品梅反革命集團，
徹底清除暗藏在天主教內的
一切反革命分子**

(續 輯)

上海人民出版社

坚决肅清製品梅反革命集团，
徹底清除隱藏在天主教內的
一切反革命分子
(續 輯)

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上海福州路五四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售

書号 1252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3 1/8 字數 68,000

一九五五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二次印刷

印數 3,001—13,003

定價 (2) 二角三分

龔品梅反革命集團背叛祖國、破壞政府政策法令、

禁止教徒愛國的部分反動証件……………(1)

偽善者的真面目……………屠培林(9)

龔品梅反革命集團主持的“避靜”真相……………葛力夫(17)

从剝削農民的龔品梅地主家庭來看龔品梅为啥反革命? ……(21)

龔品梅在我們學校裏所幹的

反革命勾當……………上海市江寧中學全體教職員工(27)

張希斌給反革命首惡龔品梅的密信……………(29)

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私刑拷打愛國教徒並劫持和毆辱

里弄幹部……………上海市大通路培德里全體里弄幹部(34)

我要揭露沈潤卿、張維屏的反革命罪行……………東昌區教友 許逢春(40)

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破壞土改、破壞互助合作運動的

罪行……………洋涇區張家樓 張增祿(43)

我愛天主教，我也愛祖國……………蓬萊區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陳夏珍(45)
新晉育堂副堂長

是誰在摧殘一門三代的心靈?……………聖母院院長 林曉明(48)

逮捕了反革命分子龔品梅好像搬去了壓在我心上的

大石頭……………聖母院育嬰堂總務股主任 潘雪芳(49)

壓在女教徒身上的大石頭

搬掉了……………上海市民主婦聯執委、天主教徒 袁蘊常(52)

我要揭發，被陷害的修女

不只是舒海雲……………廣慈醫院護士 李月華(53)

是他們把我姑母當做瘋人關了十年……………安當醫院工人 陸 麟(55)

第一殘老院老人們揭發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的罪行……………阿 章(59)

老年教徒的憤怒……………第一殘老院六十歲老人 徐宝山(63)

天主教的愛國青年！積極投入

鬥爭中來！……………上海市民主青年聯合會執行委員 陳尙正(64)

我跳出了反革命泥坑……………上海第二醫學院學生 王守遠(66)

我痛恨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毒害了

我兩個兒子……………嵩山區教友 熊秉辰(69)

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毒害了我們家中

四個青年……………盧灣區 胡鏡水 童瑞娟(72)

龔品梅反革命集團

怎樣毒害了我……………華山路小學六年級學生 王春斗(73)

我參加了少先隊，反革命分子就來打擊我！……………瞿懷仁(76)

只有清除教內的反革命分子，才能享受真正的

宗教自由……………上海市新開路第一小學教師 蘇慈珍(77)

我做了一件應該做的事情……………復旦中學初中本屆畢業生 潘書靈(78)

不能容忍我姪子的反革命活動……………存德小學 潘克球(80)

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是“法利賽人”的

教徒……………天主教南京教區代總主教 李維光(82)

為純潔聖教會，把龔品梅等法利賽教徒

清除出教會去……………濟南教區副主教 董文隆(85)

我們廣大神父教友熱愛祖國……………四川重慶教區代理主教 石明亮(87)

愛國的天主教徒，積極投入

鬥爭中來……………天主教南京教區 無錫總鐸區總司鐸 康思誠(88)

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在江西的

罪惡活動……………南昌天主堂本堂神父 孫耀漢(90)

堅持愛國愛教立場，徹底清除暗藏在天主教內

的敗類……………天主教南京教區石鼓路本堂 楊鄰德(92)

揭發龔品梅指使我破壞反帝愛國運動的

罪行……………天主教南京教區丹陽花家渡本堂神甫 崔學孟(95)

龔品梅是反帝愛國運動的

死敵……………天主教南京教區常州市本堂神甫 李玉符(97)

龔品梅反革命集團背叛祖國、破壞政府 政策法令、禁止教徒愛國的部分反動證件

“解放日報”編者按：自本報公布了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披着宗教外衣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三批材料以後，激起了各界人民和廣大愛國天主教徒及神職人員對這一夥背叛祖國、喪盡天良的反革命黑幫的無比憤怒，一致擁護政府的正確措施，紛紛揭發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的滔天罪行。但是，仍然還有一小部分受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毒害較深的人，認為報紙上揭發的材料，絕大部分是個人的揭發，認為罪証不足。這種看法當然是很錯誤的。本報今日特發表本市公安局從洋涇浜天主堂主教府龔品梅的住所搜獲的部分反動罪証。

從這些罪惡證件中，可以看到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如何披着宗教外衣，公然違反國家神聖的憲法，對抗全國六億人民所衷心擁護的人民政府，破壞政府的政策法令，並且蠻橫無理地禁止教徒和神職人員盡公民應盡的愛國天職，禁止他們參加政府召開的會議；更露骨的，他們竟敢於公然破壞為保衛祖國安全 and 社會主義建設而進行的參軍運動，反對保衛世界和平。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的這些“命令”、“信件”、“備忘錄”中的許多話，和美帝國主義與蔣介石賣國集團的口吻是完全一模一樣的。這些罪証，已無可置辯地顯露了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極端仇視祖國、仇視政府、仇視人民、仇視一切正義行動的猙獰醜惡面目。他們已完全喪失作為一個中國人的起碼條件，而成為國家的叛徒，人民的死敵。所有愛國和愛教的天主教徒和神職人

員，應和廣大人民在一起，從下列罪証中取得教訓，提高覺悟，劃清敵我界限，站穩愛國立場，揭穿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披着宗教外衣進行欺騙威脅、挑撥離間的陰謀詭計，拒絕執行一切在宗教掩蓋下的反革命命令，為徹底肅清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和肅清一切暗藏在天主教內的反革命分子而鬥爭！

一、抗拒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取締 反動組織“聖母軍”的命令

龔品梅致教務協進會趙玉明（是加拿大籍，擔任過反動組織“聖母軍”上海分會指導司鐸，曾大量散發反動書刊，破壞參加軍事幹部學校運動等，政府明令取締“聖母軍”後，數次召集會議，抗拒登記，銷毀罪証，一九五一年十月，為我公安機關逮捕，後被驅逐出境。）信（一）（一九五一年九月四日）

……現在常常有人來問我聖母軍人員應不應該去登記。

……今天聖母軍已遭到攻擊，我的態度仍然不變，……我只有祝福他們，為他們祈禱，鼓勵他們的戰鬥。當然聖母軍能站在鬥爭的最前綫，也許不久要有致命聖人（原是指為教會而犧牲的人。在這裏，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是用這種挑撥宗教感情的話來鼓勵教徒為帝國主義賣命。）是很光榮的。

龔品梅致教務協進會趙玉明信（二）（一九五一年九月七日）

……我誠心感謝你的信，這證明你完全了解我的意見，我想再向你表示我對領導聖母軍人員完全信任，在這困難情況下，他們作出的決定，必定是很明智。

此外，你可轉告聖母軍人員們，我決定在他們的考驗中爲他們祈禱，求主光照他們，賜他們以愈下去愈需要的勇氣。

“解放日報”編者按：“聖母軍”是帝國主義分子利用天主教爲掩護的反革命組織，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爲了保障人民利益，於一九五一年十月八日明令取締。從上述証件中可以看出，龔品梅反革命集團不僅違抗政府法令，而且瘋狂地鼓勵“聖母軍”人員繼續“戰鬥”，“站在鬥爭最前綫”與政府對抗。

二、阻止和破壞教徒青年參加解放軍保衛祖國

“(一)參加共產黨的軍隊本身並不等於參加共產黨，不過就其後果而言却等於：甲、參加了共產黨的活動及其擴張。乙、消極參加了參軍者所必須參加的學習。

(二)就這兩點而言‘自願參軍者’即犯了錯誤，自願參軍並不和參加共產黨一樣本身即應受絕罰，但却構成犯罪的機會，此點，單以保衛國家爲藉口而從事一種不正義的戰爭是說不過去的。

(三)被迫參軍者不必冒生命危險或其他重大損害要求退役，他這樣參加共產黨的活動是可以獲得諒解的，不过他應該站穩立場，決不應裝做擁護唯物主義的樣子，更不應轉教別人，要記住裝作擁護就構成了嚴格禁止的正式合作。

(四)由於無知而參軍者，如果他沒有必要的精神力量堅持信仰，抗拒脅迫，那末心裏就該積極設法退役。如果他可以保持信仰自由，能夠不做一切禁止的裝作擁護的樣子，則不必

要求退役。

(五) (略)

(六) (略)”

“解放日報”編者按：任何國家的公民都有服兵役的義務。天主教會是宗教團體，絕不應干涉教徒服兵役。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竟敢違抗政府法令，下令阻止和破壞教徒參軍。任何人也不能說破壞服兵役是正當的宗教活動而不是反革命破壞活動。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在上述文件中，充分流露了對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刻骨仇恨，他們竟敢說青年教徒“自願參軍者即犯了錯誤”。他們叫已參軍的青年教徒要“站穩立場”，即站穩反革命立場，對於那些不堅決反革命的青年，也就是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所謂“沒有必要的精神力量堅持信仰”者，就要他們設法離開部隊。龔品梅把教徒的愛國行動說成是犯罪，把偉大的抗美援朝鬥爭竟說成是“不正義的戰爭”。從這一証件中不是清楚地顯出龔品梅反革命集團那副充當美帝國主義者的忠實的走狗，幹着禍國殃民的罪惡勾當的真面目嗎？

三、誣毀中蘇友協與和平運動並禁止教徒參加

“關於參加中蘇友好協會的備忘錄

一、運動的表面：

運動的宗旨是為促進和平和對俄國給予中國的援助表示特別感謝，顯然並未涉及宗教而是純政治性的以及為全體人民所熱烈盼望的世界和平的事情。

二、運動的實質：

作為當前運動宗旨的蘇聯和平則是基於對資本主義和一

切所謂資本主義國家的恨，使俄國衛星國家統治全世界，因此，參加中蘇友好協會即等於擁護蘇聯和平政策和整個共產黨的政策。

三、運動的後果：

共產黨利用呼籲和平來欺騙老實人，擴張它的活動，中蘇友好協會也就是擁護共產黨的一種宣傳手段，儘管協會的章程顯然並無一條直接涉及宗教。

四、道義的裁判：

正式的參加當然是嚴禁的。因為這是一種擁護共產黨的活動，所以是嚴重錯誤的。非正式的參加（即思想上不擁護它的政策，並有意逃避一切對它可能有利的活動），即一種形式上的合作，本身並不是壞事。然而，因為它帶有起壞表樣（即榜樣）的作用，並且有危險性，所以也應該禁止。”

“解放日報”編者按：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對世界和平運動的污蔑腔調，讀起來與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賣國集團的腔調是多麼相像。從這裏可以看出他們一方面在嚷着“聖母在南朝鮮顯聖，美軍一定勝利”，“盼望美國原子彈投到中國和蘇聯去”，同時又積極破壞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的鬥爭，為帝國主義的戰爭叫囂服務。帝國主義者對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獲得國家的獨立是十分仇恨的，它們天天夢想把中國再度變成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它們對中蘇兩個偉大兄弟國家的合作和友好，自然更是憎恨。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正是在執行帝國主義的命令，利用宗教來煽動教徒仇恨中國共產黨，仇恨中蘇兩大國友好合作，阻止教徒參加中蘇友好協會。

四、破壞反帝愛國運動

(一)龔品梅告教友書：

“現在的所謂‘反帝愛國運動’，經我們仔細研究後，特聲明：其與‘三自運動’是同一性質，因此，是裂教的。

因此，凡是簽名參加反帝愛國運動者，應受絕罰，因而身敗名裂……。”

“解放日報”編者按：反帝愛國是中國人民光榮的責任。對一個教徒來說，愛國與愛教本來也並無矛盾。龔品梅反革命集團以宗教為外衣，以“絕罰”為威脅，來禁止天主教徒參加反帝愛國運動，充分暴露了他們的帝國主義走狗的真面目。愛國的天主教徒和神職人員一定能認清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的本質，粉碎其反革命破壞陰謀。

(二)另一文件

“……

神甫和主教如果在政府法庭被控而‘確實有罪’時，其他神甫……應否承認他是‘有罪的’？

……在現在迫害教會的‘帝國主義運動’的情況下，神甫們應該拒絕他是‘有罪的’。

……政府法庭往往就是控訴人或原告人，所以很難證明是公道的……因此神甫們應該說我不知道他的罪。因為刑事犯人供詞終是沒有正確的，因為在別人說還不知道他的罪行時，被告還是無辜者。法庭外都知道的罪行，主教、神甫、修士……等應該否認知道這種罪行。因為這種法庭完全是‘帝國

主義運動’，在這裏是沒有真理的。”

“解放日報”編者按：魏品梅反革命集團竟狂妄到對“確實有罪”的神甫也要否認他們有罪，這是最露骨的反抗政府的表現。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這裏爲了自圓其說，竟惡毒地“政府法庭很難證明是公道的”，並把中國人民偉大的反帝愛國運動誣蔑爲“帝國主義運動”。從這裏根本嗅不到一點中國人的氣味！

（三）關於幾個具體問題的備忘錄

“一、關於政府召集的討論宗教事務的會議：

……絕對禁止天主教神甫和教徒參加全是教徒或者同非天主教徒一起討論宗教事務的會議。（一）禁止神甫和教徒們參加政府召集的全是天主教徒的會議，不管它是否說明爲討論宗教事務，因爲經驗證明若召集的全是天主教徒，那在會議上必然討論宗教事務。（二）禁止神甫和教徒參加政府召集的天主教徒同非天主教徒一起討論宗教事務的會議。

二、關於政府組織的‘集體學習’：

這個由政府單爲神甫和教友組織的‘集體學習’，名義上固然是只談政治，而經驗證明，這種學習終要涉及宗教……因此這種學習是跟上述的會議同樣性質的，因此……禁止參加‘學習’。”

“解放日報”編者按：魏品梅反革命集團以‘討論宗教事務’、‘終要涉及宗教’爲幌子來達到禁止神甫和教徒盡公民應盡的愛國守法的職責。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七日‘解放日報’）



这是本市公安局最近从津唐地区「七教时」逃窜捕住处，搜获的部分反革命证据。这些反革命文件和所用法文及拉丁文写的。（中法分报）

偽善者的真面目

屠培林

拿宗教外衣偽裝起來的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很善於裝腔作勢，他們想藉此蒙蔽人民政府，欺騙教徒羣衆，達到他們罪惡的反革命目的。可是人民的眼睛雪亮，廣大教徒的愛國主義覺悟也在不斷提高，謊言終被識破，一切西洋鏡到底要拆穿。剝去了那件宗教外衣，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的真面目現在已經赤裸裸地暴露在大家面前了。

所謂“不問政治”

解放後，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口口声声說他們“祇辦宗教，不問政治”，而且從來就是“超政治”、“超國家”的。開始實行糧食計劃供應時，洋涇區人民政府為了照顧教會製造“聖體”所需的麵粉，特地通知天主堂派人出席會議，進行商量，以便了解具體情況後可以申請辦理供應。但是這個堂在龔品梅的統一指揮下，竟然回信說：“神職人員革於教律，不能參加政治會議”。一九五四年六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務處致函龔品梅，邀請他商談關於參加討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問題，龔品梅不但公然拒絕，在覆信中甚至囂張地說什麼‘去年四月初曾電知鈞處：‘凡不與教會有關事務，本人概不置喙’……想諸公當能記憶也。’

的確，上海人民並不健忘。過去上海天主教堂掛法國旗和慶祝法國國慶日，是眾所週知的事情。在日本法西斯侵佔上海時期，教會裏的帝國主義分子和反動分子公然利用洋涇浜堂舉行“日華陣亡將士追悼彌撒”，參加的不但有漢奸，還有日本情報機關的特務。國民黨統治時期，上海天主教會裏很多人對蔣介石非常擁護，對政治也非常關心。一九四六年，正是國民黨發動內戰、物價高漲、民不聊生的時候，全國人民都恨透了賣國賊蔣介石，而當時天主教上海教區主教惠濟良在傳教友書中，却稱頌蔣匪是“天主賜給中國的‘天才’”，教會裏的帝國主義分子和反動分子在伯多祿堂等處舉行彌撒為蔣匪慶壽，還拍發電文祝賀。土山灣印書館出版的一本教會小冊子中，居然同蔣匪一唱一和，把當時人民生活的貧困、社會動盪不安和道德的墮落全部都推說是共產黨所造成的，要教徒“懇求耶穌聖心賞賜早日消滅共產黨”。一九四七年，國民黨一手製造了假民主的偽選舉，惠濟良又叫教徒都出來投票，不但有神甫參加偽參議員的競選，有人還号召家庭婦女要特別關心選舉，否則就不是好教友。教會裏的帝國主義分子和反動分子不但這樣積極關心着國民黨的偽選舉，甚至还假洋涇浜堂為意大利的選舉而祈禱。不僅如此，他們還利用上海各堂口為偽國大舉行慶祝彌撒，假新普育堂舉行慶祝偽憲法的大彌撒。

可是解放後，由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把持的上海天主教會忽然聲稱“不問政治”了。當全國人民一致熱烈討論保障人民自己幸福生活的憲法草案時，龔品梅忽然“概不置喙”了。解放前，龔品梅曾經寫文章高呼過‘法蘭西萬歲’，解放後他還阻止

教徒連自己的祖國——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都不愛。當全國人民都為斯大林同志逝世而沉痛悲悼、停止一切娛樂活動時，龔品梅却趕去帝王堂參加美國間諜麥有文故意召開的宴會。廣大教徒在解放後積極參加人民自己的愛國活動，龔品梅却認為這都是“犯罪”行為，說他們是“壞教友”、“壞神長”和“立壞表樣”，以“停止神功”、“不給領聖體”和“絕罰”等來逼迫他們“悔過”！

為什麼從前那樣，解放後又這樣了呢？現在一剝去了龔品梅反革命集團那件宗教外衣，就看清楚瞭！原來他們並不是“不問政治”，而恰恰是最熱心和最積極從事於反對中國人民的反革命政治！他們所以萬分仇視和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是因為他們效忠於帝國主義和蔣匪幫！不講其他，單說一件事：一九五三年國慶節時，榆林區的天主教徒在和平之后堂掛起五星紅旗，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竟指使人非拿下不可，不准他們在教堂裏掛國旗。可是幾年來，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在逮捕隱藏在天主教會裏的帝國主義間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時，有時除了搜查出武器、彈藥和收發報機等東西外，還常常發現他們保存有很多蔣匪黨旗、甚至美國國旗，單單在徐家匯耶穌會神學院一個地方，就曾查出二十七面國民黨旗幟。龔品梅他們關心的是那一種政治，他們所期待和翹望的又是什麼，就從這一件事來看，難道還不夠清楚嗎？

“經濟困難”真相

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把持着的上海天主教會，在解放後忽

然顯得十分“貧窮”的樣子，他們藉口“經濟困難”，積欠了人民政府大量房地產稅。當政府要了解他們存在的具體困難，一起商談研究解決辦法時，他們卻又置之不理。一九五四年二月間，本市稅務局黃浦區分局工作人員卓寿安前去催繳稅款時，剛跨進洋涇浜天主堂堂門，便被他們橫暴地推出來，把門關上，還狠狠地說：“不許你進來！”上海天主堂出租的房屋分佈於全市二十一個區，一共有好幾千幢。這些房屋因年久失修，大半已列入危險房屋之列，有的岌岌可危，隨時可能倒塌下來，住在裏面的居民們惶惶不安，夜不成眠，曾一再派代表要求業主加以修理。可是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只管收房租，不管萬千居民生命財產的安全。他們對稅務局講，因為要修房屋，所以付不出稅；而對房客講時，卻又說因為要付政府的稅款，所以沒有錢修理危險房屋。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的“賑房”沈增祿還裝出一副無可奈何的神氣說：“經濟困難啊，教堂裏現在沒有錢……。”

解放後，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真的是“經濟困難”嗎？請看：

龔品梅的“顧問”兼“主教府財務委員會主任”——也就是“費特情報社上海中心站”的負責人、帝國主義間諜分子才爾孟，為了刺探我國國家機密，曾經先後以舊幣五百萬元收買我黃浦公安分局的一個外事警察。

龍華區七寶鎮劉君亮等兩個惡霸地主在土地改革後被分了田，龔品梅深表“同情”，立即派他的骨幹分子傅鶴洲送去舊幣三百萬元。後來因為劉君亮在七寶鎮製造擾亂“有功”，龔品梅又獎勵了他一筆錢。

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在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破獲的美國政府間諜組織‘第四十四海外觀測隊’案，主犯雷德蒙供述他曾經得到上海耶穌會“神甫”接濟他活動經費。

抗日戰爭時期在河北“冀南剿共民軍”中積極為日本特務木村搜集我軍事、政治、經濟情報的反革命分子范百祿，解放後潛逃在南京組織反動“聖母軍”，繼續進行破壞活動。一九五四年一月，范百祿來上海向龔品梅彙報工作，龔品梅發給這個反革命分子舊幣一百三十萬元，鼓勵他回南京後繼續開展活動。

龔品梅給上海“公青”的活動費用更是巨大。他表示過：“如果需要任何數量的公青活動費，願意隨時撥付”。有一次為了大規模組織“公青”避靜，進行反動思想訓練，上海天主教會的幕後指使人、帝國主義間諜分子格壽平慷慨地撥付了鉅額經費。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龔品梅親自在帝王堂依納爵廳主持全市人專學校“公青”分子的聖誕大聯歡，不但招待幾百個“公青”分子吃茶點，還贈送每人一件“主教禮物”，有綫襪、棉毛衫、絲襪、手套、日用品等各種各樣東西。平時逢年過節，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更是經常以現款或買糖果、衣料、火腿、烟酒、年糕甚至兒童玩具等大批東西分送給反革命分子家屬和被學校開除的“公青”分子，以示“慰勞”和作為“表彰”之意

.....

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有錢派遣反革命分子去進行各種破壞活動，有錢支持“公青”分子去反對人民政府，而遠在國外的帝國主義分子也源源不斷地在以“彌撒金”名義暗中寄錢來支持

他們的反革命活動。例如一九五三年十二月間，已經被我國政府驅逐出境的才尔孟，寫信來要人轉告龔品梅：“我經常關懷他的經濟利益，告訴他在傳教的彩票上，他已中了一個一萬美元的头彩……。”一九五四年一月三十一日，才尔孟來信給龔品梅“五百台彌撒”，三月二十五日又來信“奉上龔主教彌撒五百台，每台七角三分”，四月十五日又來信要人轉手“把五百台彌撒轉龔主教”……。

這就是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經濟困難”的真相。這次市公安局破獲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時，在主教府和鮑斯高慈幼會等處都搜出他們私藏的黃金美鈔。他們在暗中不斷接受帝國主義分子從國外給他們的錢，他們自己平時過生日、做銀慶毫不吝嗇，他們更不斷撥發大批經費從事於反革命的破壞活動，可是他們却“沒有錢”修理危險房屋，“沒有錢”繳納國稅，一再叫囂說“經濟困難”。他們製造“困難”的用意就是企圖引起羣眾對人民政府的不滿，而把他們自己的罪惡活動掩藏起來。

究竟是誰的災難

解放後，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猖狂地向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進攻，活動得異常忙碌和猖獗，可是嘴裏却還不斷對教徒叫囂着“教難”“教難”。

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日，帝國主義間諜分子才尔孟為我公安機關逮捕，這對龔品梅說來是一個重大的打擊。他親自到“主教座堂”為才尔孟“禱告”。據龔品梅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傅鶴洲說：“才之被捕，主教如痛失左右手”。於是才尔孟的被

捕在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口中就變成了“教難”。

一九五三年三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破獲了田望霖、林仁利用天主教掩護進行間諜活動案，抄獲情報底稿、各式密碼本和密寫藥水等很多罪証，田望霖並且供出“主教府是我的情報主要來源之一”，使龔品梅大為震驚，於是連忙又欺騙教徒說是“教難”來了，叫囂這是“共產黨壓迫宗教”。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公安局又依法將一批披着宗教外衣進行陰謀破壞活動的帝國主義間諜分子格壽平、翟光華、魏光廷、羅璋達等予以逮捕，繳獲手槍、子彈、軍用地圖、蔣匪黨旗、收報機和其他未及毀滅的各種情報底稿，這對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是一個慘重的打擊，他們嘴上的“教難”也就叫得更厲害，更响了。龔品梅一面在教堂裏親自領導拜大苦路和舉行九日祈禱，製造緊張氣氛，煽動羣眾；一面唆使‘公青’分子聚眾騷擾，甚至公然提出“不退讓、不投降、不出賣”的口號。

隔不多久，上海市內出現了以“公教青年報國團”名義張貼的、上面有國民黨黨徽的反動標語，公然希望“人民政府垮台”，希望他們“最敬愛的領袖”蔣匪“回到大陸來”，甚至还無恥地寫有“美國政府萬歲”。這些反革命分子在心急慌忙之中，竟然將他們和美帝國主義及蔣介石賣國集團的親密關係暴露了。正是這些口口声声叫囂“教難”的帝國主義間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焦急地盼望着美蔣在中國大陸上復辟。

人民政府切實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新中國的宗教徒安居樂業，完全可以在教堂裏自由地進行自己的宗教活動，政府從沒有干涉他們的宗教信仰，他們也從沒有遇到什麼‘教難’。龔

品梅反革命集團要的究竟是宗教信仰自由呢，還是反革命活動的自由？

美國間諜分子翟光華已經供認：一九五二年十月的耶穌帝王瞻禮日，教會本來準備這一天要在帝王堂花園內舉行盛大的宗教儀式，碰巧那時候有很多外國和平代表紛紛來上海參觀，就住在鄰近的錦江飯店裏，龔品梅為了怕他們看到新中國完全有宗教信仰自由，特地命令把這一宗教儀式延遲一星期，等這許多和平代表離開上海後再舉行。其目的就是要讓國際友人認為「中國沒有宗教信仰自由」，而便於龔品梅他們自己製造「天主教在中國遭到了教難」的謊言。

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破壞國家的用心和手段就是這樣的毒辣！

不管反革命分子多麼狡猾和會耍花腔，披着宗教外衣的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終究被破獲了。現在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的真面目已經揭露，我們一定要徹底肅清這一罪惡集團，清除暗藏在天主教內的一切反革命分子，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四日解放日報）

龔品梅反革命集團主持的“避靜”真相

葛力夫

“避靜”是天主教內为了提高神修的一種宗教生活，過去也是一向有的。可是解放後由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所主持舉行的“避靜”，就完全變樣了。

很多虔誠的天主教徒都清楚記得：“避靜”在解放前一年都只舉行一次，每次三天，參加的人多是年長的教徒，青年即使“避靜”，也和大家一起，並沒有特別加以區分。可是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在解放後為了他們反革命的需要，欺騙教徒說什麼“現在教難開始了，為了教友神修方面更加需要”，因此把教徒中的學生、教師、護士、醫師、工人……甚至兒童分別組織起來參加“避靜”。他們又特別重視青年的“神修”（實際就是想更嚴重地毒害青年），因此又把學生中的大學生和中學生、中學生中的高中生和初中生、男生和女生分開“避靜”，以便於他們控制。除了年度“避靜”外，龔品梅反革命集團還想出發月增加一次“月靜”，教徒學生一年中還有寒假和暑假兩次“避靜”，應屆畢業生並特別有一次“畢業避靜”。在一九五二年二月，龔品梅反革命集團通過這一年的寒假“避靜”，就在平津中建立了“教理小組”；他們在交通大學的“教理小組”後來並進一步轉化為更隱蔽的“神修小組”，就這樣以宗教名義欺騙和利用青年，使“教理小組”或“神修小組”都成為他們進行破壞活

動的基層核心組織。

按照教會慣例，“避靜”有一定的日程，領“避靜”的神甫應該按照教義來講道。可是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完全不是這樣。在“避靜”時，他們針對人民政府的政策和各項運動，竭力詆毀與誣蔑共產黨及人民政府，挑撥教徒宗教感情，製造恐怖與疑懼氣氛，從而想鼓動大家起來仇視與對抗人民政府。他們甚至利用每次“避靜神功”機會和教會規定的“神功秘密”，公開向教徒進行反共反人民宣傳和給予反革命活動的指示。有些教徒因為不能嚴格區別神長和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又怕講出去違反“神功秘密”，要“犯大罪”，因此就落入了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的圈套。例如在“避靜”的“神修講座”中，龔品梅反革命集團進行威脅恐嚇，不准教徒擁護驅逐帝國主義分子黎培里，否認教會內有帝國主義分子，說戰犯于斌不是反革命分子，指示教徒不能簽訂愛國公約，不能擁護共產黨，還說揭露教會內帝國主義分子罪証展覽會的材料都是假的……。一九五三年三月中，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破獲了田望霖、林仁利用天主教掩護進行間諜活動案時，他們“月靜”的講道中心也就一變而為“教難”。等到全國大張旗鼓宣傳總路綫開始時，他們“月靜”的講道內容又一變而為“血淋淋的總路綫”……。一九五三年二月三日，龔品梅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章獻猷在洋涇浜堂為參加“避靜”的初中以上教徒學生講道時，居然吹噓起什麼“美國皮鞋店用愛克司光來替顧客量腳尺寸”……這那裏是在要教徒“崇敬天主”和“鞏固宗教信德”，完全是要人家去崇拜美國“文明”和鞏固對帝國主義的“信德”！

“避靜”的內容原來是听道理、默想、省察自己平時的行为有否違背教义，然後定志今後如何做。可是龔品梅反革命集團一年兩次為學校“公青”分子舉行的寒假和暑假“避靜”，却是要他們回想檢查自己一學期來有那些行為“不忠於教會”，“違背了信德”（實際就是要人家檢查一學期來為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工作得好不好，對他們是否忠誠）；然後定志今後怎樣更好地去和“魔鬼”及“惡劣環境”鬥爭（也就是怎樣去和中國共產黨及人民政府鬥爭）；在“避靜”最後，還要人家寫‘決定書’，放在祭台上奉獻天主（實際是向龔品梅反革命集團作保證）。一九五一年下半年，“聖母軍”骨幹分子鍾桂芬因為向政府登記退團；被反革命分子朱樹德知道後，在“避靜”中就逼迫她在“決定書”上寫上自己曾‘跌倒’過（實際是跳出了反革命泥坑），“侮辱聖母”（也就是違反了龔品梅反革命集團不能登記退團的命令），失了“信德”（也就是反革命的決心不堅定），保證以後要効忠到底，“雖死不屈”。一九五三年全市大專院校“公青”分子“避靜”時，龔品梅還親自去主持“信德宣誓”儀式，以効忠“基督”為幌子，要所有“公青”分子都舉手向他宣誓，保證願為他和他們反革命集團効忠至死。

為了毒害和利用青年，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對“公青”分子的“避靜”活動經費毫不吝嗇。一九五二年八月，為了“慶祝思想改造運動勝利”（應讀作慶祝破壞思想改造運動勝利），在帝王堂舉行全市大專學校“公青”的“避靜”後，由龔品梅招待晚餐，將他自己的相片分送每個人，並且要畢業的“公青”分子把上海教區的反革命“精神”帶向全國各地。一九五二年，帝國

主义間諜分子格寿平時地撥了舊幣三十萬元作为‘避靜’活動經費

这些反革命分子为了利用“避靜”來毒害青年，甚至不擇手段，不顧一切。龔品梅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楊秉驥等在誘騙交通大学教徒学生去佘山“避靜”時，要他們違犯政府法令，私运粮食和食油出境。“避靜”時按照規定應該嚴守靜默，参加“避靜”的教徒除了能同領“避靜”的神甫交談外，不可以和其他人講話。可是交大“公青”分子在今年春節期間去佘山参加“畢業避靜”時，在還沒有“出靜”前，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就要他們在神甫飯間裏開座談会，討論畢業同学以後如何联系的問題，同時秘密佈置“公青”骨干分子在忠誠老实運動中什麼可以交代，什麼不可以交代，統一口供。神甫飯間一向禁止婦女人內，那一天为了讓一个女“公青”分子也参加座談会討論，居然也破例加以‘寬免’了。

看了上面这些内容，誰也能認清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利用“避靜”所進行的活動，究竟是宗教活動，还是帶有政治目的的反革命活動了。这連龔品梅的“神学顧問”、帝國主义間諜分子格寿平自己也已經供認：解放後他們所以加强“避靜”活動，其目的就是要使教徒“反对政府領導的運動”。

这就是解放後龔品梅反革命集团所以經常要主持“避靜”的真相。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七日“解放日報”）

从剥削农民的龔品梅地主家庭 来看龔品梅为啥反革命？

“信鴿半月刊”編者按：龔品梅反革命集团被破後，激起了廣大人民和廣大教友的不可抑制的憤怒。連日來，上海市三万多教友分別舉行大會，聲討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在这些大會上，这个集团的滔天罪行已遭到廣泛的揭發，鉄証如山，無可置辯。但是還有一些天真的人們在問：为啥龔品梅这样坚决反革命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刊記者特去訪問龔品梅的家鄉——川沙縣唐墓鄉第一村，查一查龔品梅的出身問題，原來这个反革命集团首惡分子龔品梅乃是当地一个大地主，这个龔家地主在農村中作惡多端。龔品梅反革命集团被破後，曾經遭到他家毒手的農民紛紛控訴了龔品梅地主家庭的罪惡，特別是龔品梅利用教会地位破坏土地改革的罪行。从這裏，我們就看到龔品梅坚决反对革命的階級根源。

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對於土地改革運動是極端仇視的，这个集团曾下令各地天主教友：“不得分地主的土地和財物”，“不得在公審大會上控訴地主”，並且还把天主教会的土地契約拍成照片，暗送國外說：“待人民政府垮台後，憑这些証据收回。”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龔品梅反革命集团是完全維護封建地主利益的。他們為什麼採取这个立場呢？原來这个集团的首惡分子龔品梅就是地主。他們進行反革命的目的，就是妄

想顛覆人民政權，使帝國主義和蔣匪幫復辟，可以重新騎在農民頭上，殘酷剝削農民，過着吃喝豪華的生活。他們是廣大農民的死對頭，也是農民教友的死對頭。

龔品梅出身於川沙縣唐墓鄉第一村。他家是全鄉最大的一个大地主。他祖父龔文輝是當地天主堂的董事，也是帝國主義欺壓中國人民的爪牙。帝國主義分子鄂勞（法籍）在六十四年前就以傳教為名來到唐墓鄉，利用龔文輝等地主惡霸，建立帝國主義勢力。曾有農民朱阿香在談話中露出一點對帝國主義分子的不滿，就被鄂勞和董事龔文輝要縣官派人把朱阿香抓到川沙坐了一個月的牢。在這一個月中，每逢星期日，还把朱阿香戴着枷鎖，前後心貼着罪狀，送回來用鉄鍊子鎖在天主堂的鉄欄柵上示眾。龔品梅的父親也做過天主堂董事，做過帝國主義分子‘順神甫’（法籍）的跟班（狗腿子），還做過為帝國主義分子所控制的上海新普育堂的賬房。龔家還有一個女惡霸，綽號“雌老虎”，這就是龔品梅的母親。龔品梅就是這樣一些地主惡霸，帝國主義走狗的子孫。

龔品梅被逮捕後，唐墓鄉農民紛紛控訴龔品梅的罪行。揭露他不但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而且是一个打着“救人靈魂”的幌子的殘酷的吸血鬼。唐墓鄉一村老農民徐月明說：“从前‘雌老虎’催租時經常說：‘我是代神父收租的，租米快點交，神父等着要用錢哩！’”龔品梅兄弟三房，土地改革前僅在唐墓鄉附近就有土地一百八十七畝二分。除二十三畝僱工耕種外，其餘分別租給三十八戶農民，同時還以高利貸大量地榨取農民的血汗。這一切都是由龔品梅母親一手經

办的。

土地改革前龔品梅一家依靠封建的土地佔有制拚命地剝削農民。不但通过地租把農民的勞動果實佔为己有，而且用多報出租田畝，預收租金的辦法進行額外剝削。農民龔復生租種龔家三畝田，實際只有二畝半。龔景梅娘租一畝半，實際只有一畝一。龔進明向龔品梅母親租一畝半田，她說：“你先交租米我才租給你。”以後龔進明雖然預付了六十四斤租米，可是却沒有租到田種。如逢歉收或農民生活困難付不起租米時，龔品梅母親便要收回土地。老農民孫夢林控訴：他曾租龔品梅家裏三畝田，有一年因棉花歉收，又因老婆生了孩子生活困難，欠十八元租金，雖然小麥已經種下，龔品梅母親也還是硬把土地抽回去了，以後把田轉租給土匪陸牛才，因此孫夢林雖然沒有收到小麥也不敢吭聲。如果農民想在土地上做別的生產，龔品梅母親便乘機敲榨。農民秦阿金想利用租進的土地做經布場，龔品梅母親就要他每年每畝多出二倍的租米。秦阿金無法只得照出。

龔品梅的母親“雌老虎”，還強迫佃戶為她作奴隸似的勞動。夏天在棉田除草的時候，天一亮，她听着天主堂的鐘聲就派人催佃戶到他自己經營的田裏工作了。如有個別農民為了搞好自己田裏的生產而不願去，她就令使女把鋤頭拿到她的田裏，自己還要去大罵一頓。龔復生和龔梅牛的老婆都會被她拿過鋤頭，受過她的罵。為她家工作時，她不放工，農民不敢回家吃飯。可是早晨要等龔品梅母親吃飽了飯出來才放工，時間至少已到九點半左右了。放工吃中飯，要到十二點半以後，飯

後馬上就強迫農民下田工作了，直到天黑為止。晚上放工前，她總要催促人家“快做快做，一蟲可抵一工”，最後把農民一天的氣力榨完。龔梅牛的老婆說：“在給龔品梅家裏鋤棉田的時候，龔品梅的母親還常常下田催人家快點鋤，弄得人家連伸腰的時間也沒有。”可是就是這樣地流血流汗，龔品梅家所付的工資總還要比一般低四分之一左右。

當龔品梅母親叫農民為她割麥的時候，她分配的田畝，一定要農民保證一天中割完，因此一個人要做一個半人的生活，往往做到深更半夜還做不清。當地習慣割麥工資是按畝分麥的，可是她為了多剝削一些却改發工資。龔品梅這一家吸血鬼，甚至對少年農民的剝削也毫不放鬆。一般十四、五歲的少年，在有些生活上雖然做得和大人一樣，也只能拿到一半工資。女青年龔龍珍說：“這事我永遠也不會忘記。”

龔品梅家裏對待長工，更是像對待牛馬一般。在龔家做過十二年長工的張雲山控訴：他廿三歲在龔家做長工，一年到头常常天一亮就起來一直做到半夜，龔品梅母親吃的是參湯、白米和魚肉，他吃的是大麥飯和剩菜，並且一有叫他在放貓飯的桌子上吃。他這樣吃苦受罪，也養活不了老婆孩子，在龔家做了四、五年後，就將一個四歲的小姑娘送給別人了。後來龔家做出“好心腸”的樣子租五畝田給他，由他老婆耕種，租金由工資中扣除，可是除了租金，工資已所剩無幾了。解放前三年，他實在活不下去了，只得要求停了工。第一年出來，他名義上雖然不做龔家的長工了，實際上仍要替龔家代種十五畝田，生活做不完，夜裏在月亮底下種，有時還找臨時工代龔家做，可是

秋收時，龔家分了八分他只分到二分。結果比做長工還要苦。第二年不給龔家代種了，龔品梅母親就強迫把一头老牛賣給他，只值六石米硬要八石。張雲山要把牛拉上市估估價，她說“你如果不要，我的田就不給你種”，因此他只好忍氣吞聲把那頭老牛買下來。他向人家借了六石米錢還了牛債，還欠一石米，又代龔家做了一冬一春的生活才算完。以後用龔家水車每年要付三百斤稻，借用龔家的牛棚、犁、草刀等農具要代龔家耕種十畝麥田，另外每天早晨還要到龔家做挑水、掃地、养猪等各种雜務，一直到解放為止。

龔家的高利貸剝削更殘酷驚人。現在我們只要看老農民徐阿金的控訴就知道一般了。有一年徐阿金生活困難，想賣兩畝田給龔家。龔品梅母親說：“我家上輩說過的，現銀不買田”，你要借錢可以借給你。”徐阿金的二畝田原來要值二百元，可是因為他窮得沒有辦法，只得借了她五十元就把田押出去。從此他不但每年要交十元的租金，而且借來的那五十元還月月生息。五年後五十元就漲到一百元了，這時“龔老老”就把這一百元作為地價把田買去。交約時，限五年為期，期滿不贖，土地便歸龔家所有。可是徐阿金到期贖田時，她却不給贖了，徐阿金到上海找龔品梅的兄弟龔勝梅講理，龔勝梅就仗仗龔品梅和帝國主義分子的關係威脅和欺騙徐阿金說：“方單（契約）放在徐家匯天主堂外國神父的鐵箱裏，外國人回國去了。”以後他實在無理可說，才寫了一個憑据給徐阿金，讓徐阿金把田贖回。次年徐阿金又另外付給他廿元，才把契約討回來。這樣，徐阿金借他家五十元，十年中連本帶利，加田租，以及龔家最後

的敲榨，一共就付出了二百廿元。

看！龔品梅一家就是这样一夥殺人不見血的強盜。可是这一夥強盜剝削農民的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終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被翻身的人民摧毀了。这就是地主分子龔品梅仇視人民、仇視革命、勾結帝國主义進行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反革命活動的階級本性。

下面我們再來看看龔品梅和他一家破坏土地改革的情形。原來他家在唐墓鄉附近的一百八十多畝土地都是在龔品梅一個人名下的，可是在土地改革開始時，他家的土地却用兄弟三人的名字登記了。另外他家还送雲文奎土地二畝，送張雲山土地八畝，收買他們叫他們不要參加鬥爭。在土地改革中，龔品梅一方面和帝國主义分子格寿平一起把地契拍成照片送往國外，一方面又利用他反革命集團分子刘季澤在唐墓橋天主堂造謠說：“現在地主受苦，將來能升天堂，把人家的东西当自家的是有罪的，地主被鬥爭天主知道。”來威嚇農民叫農民不敢分田。土地改革後，龔品梅回家，住在天主堂，地主龔雪珍、龔丁氏去看他，他安慰他們說：“現在是魔鬼世界，不会長久的。”另外他家还指使原來在他家做过使女的銀珍在土地改革後數次向張雲山收租，但却被張雲山拒絕了。

現在唐墓鄉農民正在以解放後翻身的事實來駁斥隱藏在天主教裏的反革命分子的謠言，廣大農民听到反革命分子龔品梅被逮捕後都熱烈擁護，七十二歲的老農民徐樹堂說：“龔品梅和政府作对就是同我們老百姓作对，捉得好！捉得好！”

龔品梅在我們學校裏所幹的反革命勾當

上海市江寧中學 全體教職員工

披着宗教外衣進行陰謀活動的反革命分子龔品梅，曾於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間在我校前身金科中學及金科小學（即餘姚路第一小學）擔任校長。在這三年中，他一貫幹着殘害青年學生的罪惡勾當，進行着反革命的罪惡活動。

每學期開學，龔品梅發給每個新學生一本“學生手冊”。裏面有百多條規則，大都是摧殘青年學生的身心健康的。如總則第四條規定：新生入學後六星期內為試讀期，試讀期滿，查有成績平庸或精神態度與本校旨趣不合者，得令其退學。”所謂精神態度與本校旨趣不合，實際上就是指願不願服從其法西斯統治，願不願接受其奴化教育。又，總則第四十條這樣規定：“無論何時何地，無教員或監學之准許，不得離羣他適。”所謂“不得離羣他適”還不是指不得離開他的直接或間接監視嗎？龔品梅在解放後偽裝超政治超階級，但在蔣賊統治的年代也是多麼忠心耿耿地為蔣賊効忠啊！在那本“學生手冊”中，他規定將一學期的十八個星期劃分為十八個訓育週。在第一週的“紀律週”中，他訂出這些條：“今日我要遵守校規和服從級長領袖的指導，為他日遵守國法和服從元首的預備。”這個“元首”當然是指蔣介石。在第十二週的“忠勇週”中，他訂出：“對民族國家須盡忠。”我們都知道，解放後龔品梅一直不准天主教堂懸五星紅旗，但在解放前他却諄諄告誡青年學生要對蔣賊統治的國家盡忠。當全國接近解放，上海人民日夜盼望人民解放軍來臨

的時候，龔品梅還罵共產黨是“奸賊”，叫青年學生看蔣賊陰謀。後來，他見到蔣介石賣國集團要垮台了，竟不惜大言不慚，叫青年學生去扶持它，去反對共產黨，在第十六週“行善週”中他訂出：“持危扶顛，去惡除奸。”當時有一個高中學生代表同學要求成立班會，龔品梅就惡狠狠地對他說：“你們要組織班會，就是要反對我。反對我的人我是一定不寬容，共產黨要殺頭。”

接近解放時，龔品梅拼命發展“聖母軍”反革命組織，指它一些反動的教師和學生充當這反動組織的正副會長和職員，組織一些落後學生參加活動。在全國愛國教友控訴帝國主義分子專制的時候，“聖母軍”分子的教員就在討論會上公開說：“黎培里是神長，不可反對他。”在取締“聖母軍”的時候，“聖母軍”分子的教員和學生堅不坦白，甚至隱瞞自己的身份，在金科小學（餘姚路第二小學）竟有八個教員是“聖母軍”的會長和職員。這些“聖母軍”骨幹分子平時在學校中打聽各團員和進步同學，偷竊團內文件。在參加軍事幹部學校運動中他們公開破壞。在控訴“聖母軍”指導司鐸譚景星的大會場上，他們竟用被布浸火油，點火拋在會場門口，企圖縱火。

這些“聖母軍”分子都是龔品梅一手培養起來的，他們惡毒地破壞我校的教學工作，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上海解放後，青年學生紛紛投入愛國運動，但龔品梅卻命令把學校大門關起來，不讓學生出去參加遊行。那時有交通大學學生宣傳隊到金科中學來宣傳，龔品梅先是閉門不納，後來耐不住了，等宣傳隊進門，他就命令全校學生進教室，延長上課時間，不准學生到操場去宣傳。

一九四九年六七月間，龔品梅離開學校，到蘇州教區做主教去了。但他並不放鬆對金科中學青年學生的摧殘行動，他把教員沈和姚景星，

繼續作惡。潛伏在大通路景德中學的一個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曾用楊車把大批無線電通訊器材搬運到金科中學不藏私，還請景星替他把这些違禁品放在學校的儀器室裏。其中有無線電收發機、軍用對講電話等，現在我校的好幾位老教師都曾親眼看到這些東西。去年我校修建飯廳時，工人們在廚房牆外挖出步槍和手槍子彈八十五發。從這些事實看來，這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不是帝國主義特種間的間諜特務是什麼！鐵証如山，不容狡賴。

今天，我校師生員工的眼睛擦亮了，全校已投入轟轟烈烈的鬥爭。在學校黨支部的領導下，我們有信心連根拔除醜惡的反革命集團，留下的一切毒害。

（一九五五年七月十六日“解放日報”）

張希斌給反革命首惡龔品梅的密信

“解放日報”編者按：公安機關查獲了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的大批罪証，這是從洋涇浜天主堂龔品梅的房間中查獲的龔品梅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張希斌（龔品梅的顧問）給龔品梅的一部分密信。從這些信裏，可以看出張希斌在龔品梅的直接指示下，進行猖狂的反革命活動的一些事實。

這個張希斌究竟是何許人呢？據初步查明，他原來是另有來歷的。張希斌又名張登儒。他老早就勾結日本侵略軍、國民黨反動派和美蔣特務，一貫出賣祖國，堅決與人民為敵。日寇佔領蘇州時，他正任蘇州育原中學校長，獻媚日寇和漢奸頭子；抗戰勝利後，自稱在偽區與國民黨反動派“地不分，人

有联系，自称是做“地下工作”的。一九四八年任揚州震旦中学校長時，与數任將破揚州警察局長都有勾結，与蔣賊警察局有特設电话联系；並在該校親自講授蔣賊的“中國之命运”。他又一貫在学生中發展反動組織，迫害進步学生，破坏学生运动，先後在苏州有原中学、揚州震旦中学，强迫学生参加三青团，組織“蜜蜂团”、“勤工团”、“学生憲兵”、“俠客团”（又名“俠客隊”）、“特訓班”等反動組織，对学生实行法西斯訓練。揚州解放前夕，造謠誣衊“共產党是殺人、放火、姦淫、擄掠的土匪”，强迫学生流亡。解放後繼續在苏州有原中学散發反動小冊子，進行反革命宣傳，破坏鎮压反革命、参加軍事幹部学校、反帝愛國等各项愛國运动；後潛入上海，不斷發展反革命組織，進行各种反革命活動，直到被逮捕为止。

這裏摘要公布的六封密信寫在今年七八月間，即他們在大通路天主堂私刑拷打愛國教徒顧平生、趙持殿辱罵并槍斃的事件發生之後。張希斌用这些密信向張品梅作了一連串的報告和請示。我們在信後附必要的說明。

一九五五年七月七日信

此間事件想×公代為詳稟。

今天下午二教友代表去辯論，教友忠勇異常。……郝、陳二教友当然未出。

控訴會已開過，重點在斌指使放火等等……。

有發展形勢，尚不可斷定。

▲【此間事件】這封信寫在事件爆發後的第二天下午。

▲【教友】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用宗教做外衣，他們把同黨的反革命分子或爪牙也稱呼為教友。

▲【二教友代表去辯論】事件爆發後，當地公安分局派出所找張希斌在第二天下午去談話，張希斌竟違抗不到，派了他的爪牙去派出所作種種無恥的抵賴。

▲【郝陳】指郝啓駿、陳祖煥。陳祖煥係國民黨特務，曾在蔣匪“花山特訓班”受過偵察、化裝、爆破等特務訓練，解放後加入反動組織聖母軍，繼續進行反革命活動。郝啓駿也是一個反革命分子。

▲【斌指使放火等等】張希斌曾指使人在廚房裏放火，企圖造成炊事員無可推卸的責任，以嫁禍於顧平生。事發後，附近里弄羣眾激於義憤，紛紛揭露他們的滔天罪行，其中也揭發到此事。

一九五五年七月九日信

前昨控訴會，一天多處分時舉行。今天上午下午尚有多次。

教友要求准許冒險……。斌認為……。犧牲太大，不為也。

郝陳躲避中被執，……。郝一生從未低頭，壯烈入獄。

主教前尤考慮遣派（可能）——刻苦耐勞胆人之孫神父來此，今懇主教提前考慮，以防即在目前之逮捕。

▲【教友要求冒險……】張希斌與同黨爪牙們曾策劃陰謀破壞里弄羣眾大會，張希斌認為公開破壞的方法會暴露自己，損失力量。

▲【郝陳躲避中被執】特務分子陳祖煥和反革命分子郝啓駿是私刑拷打顧平生、毆辱里弄幹部一夥中主要打手，行兇後，躲藏在入通路教堂鐘樓最高一層夾板中，但當晚即被我公安人員搜出，予以拘押。

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三日信

屢承嘉慰，感甚；此種情況中得之，尤覺親切。……

非偶發事件，非局部事件；發展之速且猛，而未能照彼等部緒（署）耳。

斌為謹慎計，足不出戶，守望仍見奇細，斌絕不肯作無謂犧牲，人或笑為怯弱乎。健康情況，反見進步。……鞠躬尽瘁，死而後已，能作至生命最後一分鐘。

▲从这封信裏，可以看出 龔品梅 是不斷地 給予張希斌 指示 和鼓勵的。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信

上週平靜無事，……被難教友忠貞不貳。……其他莫不毅然決然等待可能之幻變突變。

兒童要理班開始，……須賠累，得益何啻十倍也。

斌胆小計，仍堅持足不出戶。……不願因可免之出進而遭無謂麻煩。……

▲【被難教友】指被捕的反革命分子陳祖煥、郝啓駿等。

▲【兒童要理班】張希斌 購置了很多玩具 和點心糖果等，誘騙兒童到他那裏去，以反革命思想毒害兒童的純潔的心靈，要兒童仇視政府，不愛祖國，不好好學習，仇視學校教師，搗亂課堂等等。這是他們反革命破壞活動的一部分。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二日信

上週教堂尋事，最兇狠之二人，已同於前晚鑼鑼入獄。……郝某處無法送物，昨日送去者受中斥。

公青日內所受之威脅，極重極大，“披着宗教外衣之反革命”已公開的揭示為鬥爭對象。……似應令各堂口一致為公青祈禱——“怕刺激”、“等穩健持重”等論調，不知是何居心？愚意八月二十二日聖母聖心占札前一週內各堂口一致天天公拜一苦路或其他公共神學，一定有作用。彼企圖予人“限局部性”印像（象）者，將亦知有所戒懼。不知以為然否？

▲从这封信裏可以看出：許多被他們利用毒害的青年紛紛轉變，使他們極為驚慌。張希斌於是向龔品梅獻策，斥責了他們內部不同意硬拼的分子。這裏完全暴露了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的本來面目。

此信具體日期不詳

寄奉若干文件照片。

新成區協商會週來又在煽動反宗教，拉攏及煽惑，又開讀小組擴大聯歡會。入場券的散發之速創造新紀錄。

狗咬的兇，足見自身胆小？

▲【煽動反宗教】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總是把他們的罪惡的被揭露講做“反宗教”。

▲【狗咬的兇】這表現了這個反革命分子對我們人民及偉大的新清反革命鬥爭的惡毒的侮罵和刻骨的仇恨。

▲這幾封密信和張希斌的這篇歷史的被揭露，又一次有力地剝下了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的外衣，赤裸裸地暴露出了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的猙獰面目。一切善良的天主教徒和愛國人民，應該從這裏進一步擦亮眼

請，認清他們，徹底肅清萬惡的龔品梅反革命集團。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七日“解放日報”)

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私刑拷打愛國教徒 並劫持和毆辱里弄幹部

顧平同志：

我們是本市大通路塔德里居民委員會的 全體幹部。政府破獲了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我們感到莫大的興奮，因為我們親自看到過這個反革命集團的罪行，並且同這個反革命集團的骨幹分子張希斌等進行過鬥爭。張希斌等反革命分子在我們這一帶作惡多端，要一下子寫出他們所犯下的全部罪行，那是寫不完的，這裏我們只揭發最近發生的一個事件。

他們仇視教徒愛國守法

大通路天主堂，在我們居民委員會所屬的地區。

一九五五年六月三十日，有居民顧平生前來請求我們居民委員會替他調解大通路天主堂張希斌等對他進行迫害的事情。顧平生是天主教徒，是大通路天主教堂的炊事員。以天主教神職人員名義，把持大通路天主教堂的是龔品梅反革命集團中的骨幹分子張希斌。在一九五五年二月廿一日晚上，張希斌指使張忠明出面，假藉堂內經濟困難，停止了顧平生的工作，企圖用這個方法迫使他自動離開。顧平生在天主教堂內工作已有廿七年，在這個堂內也已有七年之久，如今突然聽到要停止

他的工作，他很焦慮，幾次三番央求神甫，繼續給他工作做（顧平生曾親自去請求过好幾個天主教內的人幫助解決），都不得結果。顧平生的侄子顧振民也去和張希斌當面商量，也無結果。

為什麼張希斌蠻不講理呢？因為顧平生不願為他們進行反革命勾當，他又怕顧平生向政府揭露內情，所以決意要把顧平生趕出教堂去。顧平生是個正直、老實、並熱心於自己宗教的人，這是教徒們和居民們人所共知的。顧平生同時也是個愛國守法的公民，他發現教堂裏有個來歷不明的人，叫郝啓駿，被張希斌長期隱瞞，安插下來，不報戶口，但為掩蓋顧平生的耳目，竟欺騙說：“郝啓駿已報了戶口了。”戶籍警查戶口時，堂內其他人在張希斌指使下隱瞞事實真相，顧平生卻把真實情況告訴了戶籍警，因此張希斌懷恨在心，於是就用種種方法予以打擊和迫害，企圖逼迫顧平生自己離去。他們的迫害手段竟無恥到這樣的程度，譬如：堂裏每天公菜金只發一元二角，而張希斌却在教徒面前說每天交給顧平生的公菜金是兩元五角，污蔑顧平生“揩油”。張希斌一方面不給顧平生工作，另一方面欺騙教徒說顧平生不做工作，企圖造成教徒對顧平生的不滿，要使顧平生感到在這裏無法容身。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日那天，張希斌又指使人事先把廚房裏的自來水龍頭拆掉，再在一天下午唆使一個年輕教徒在廚房裏用木柴放火，企圖嫁禍於顧平生，幸虧為教堂內另一工人發覺，把火撲滅，未能達到目的。

強逼七代老教徒離開教堂

顧平生迫於生活，戀於宗教感情，一再耐心懇求張希斌，不逼他離開，但張希斌把他視若眼中釘，繼續橫加迫害。事情一直拖延至八月

底，這時，顧平生已五個月拿不到工資了。這五個月中顧平生過着十分痛苦的生活，要每天早上四點多鐘起來，守在扶梯旁邊，一直等到張忠明下樓，才討得五角五分錢，來維持一天生活。有時見不到張忠明，就一天飯食無着；有時他們故意讓顧平生餓到上午十時才發給他錢。顧平生就這樣半飢半飽地捱過了許多日子。八月底，顧平生再也無法忍受下去了，迫於無奈，才來到我們居委会，請求調解。

居民委員會為了對居民負責，使顧平生的工作和生活有所保障，就派了三位同志去天主堂進行調解。張希斌叫張忠明出面，無理抗拒調解。當時我們不明白他們所以對顧平生進行迫害的真實原因，因而再三耐心說服。

在居民委員會進行初次調解的第二天，即七月一日，顧平生還像以前那樣討取伙食費，但只給五角了，到七月五日又減少到四角。

事情的發展越來越嚴重了，就在減少到四角的這一天，教堂裏做過彌撒後，張希斌吃過早飯，就派了郝啓駿、周良志兩人突然把顧平生從房間裏喊出來，污蔑顧平生“反宗教”，又把痰吐在顧平生的臉上，進行種種污辱。顧平生忍氣吞聲。晚上七時，顧平生呆在自己房間內，張希斌又指使郝啓駿等一夥人一拥而上，兇惡地拿了一根繩子放在顧平生面前，進行武力威脅，並辱罵顧平生是“狗”、“畜生”、“反宗教”，強逼顧平生在五分鐘之內“認罪”。就這樣一直鬧到十時，其餘一些人回去了，郝啓駿一人獨自留下來，兇狠狠地對顧平生說：“限你明日八時把戶口遷出，離開教堂。”顧平生被郝啓駿等一夥人糟蹋到如此地步，越想越委屈，尤其是他想到自己是七代老教徒，在教堂工作了廿七年，竟被污蔑為“反宗教”，心裏萬分難過。

捱過一夜，次日清早他又到我們居民委員會來，訴說自己的痛苦，

再度請求調解。我們居民委員會有八人在九時卅分到天主堂去調解。這次張忠明出面，更加橫蠻了，把我們居民委員會接受居民合理要求、善意調解他們的糾紛，說成是干涉教堂內部的事，抗拒調解；並在談話沒有結束時，就揚長而去。這還不算，張希斌等對我們居民委員仇恨到極頂，竟指使了一夥人來和我們吵鬧，污蔑我們支持“反宗教”。他們的狠毒用心在於污蔑人民政府的堅定不移的保護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他們說：“居民委員會支持反宗教的人，而人民政府又支持居民委員會。”他們想從這種無恥的污蔑中，對人民政府的政策進行惡毒的中傷和破壞。當然這是無法得逞的，於是，他們進一步要出流氓手段，說：“你們好去了，我哋教堂裏東西多來交關，常常少掉，以後不要來囉哩囉嗦。”張希斌採用這種方法想使我們居民委員會不敢再調解這件事情。

反革命分子的猙獰面目

到了第二天，顧平生因為受了侮辱和威脅，居民委員會又調解無效，只得暫且出去逃避，但到了晚上無處安身，猶豫到九時半左右，不得不硬着頭皮回去睡覺。他走到教堂門口，又不敢進去，怕他們真會下毒手，或是像昨夜一樣，遭到他們侮辱和威脅。但不回去又睡到什麼地方去呢？最後終於胆戰心驚地進去了。進去時，張希斌和郝啓駿等一夥人正在一起，一見顧平生走進，張希斌就上樓去了。在張希斌吩咐下，郝啓駿、陳祖輝、周良志領頭，不由分說，抓住顧平生逕往“飯廳”裏拖，連拉帶拖，把顧平生的外衫扯破了，左肘也被弄得皮破血流。顧平生被拖入“飯廳”後，他們即將玻璃門全部密密關緊，他們頓時把教堂變成了刑室，幾個人一齊拥上，陳祖輝打面頰，周良志打胸膛，郝啓駿拍桌子助威。顧平生急中呼喚救命。天主堂隔壁里弄居民聽到喚救命聲音，便立

即報告居民委員會。我們居民委員會幹部男女四人和居民兩人馬上趕到出事地點。我們幹部一進去，郝啓駿等一夥人就猙獰地說道：“你們來得正好，來得去不得。”我們幹部一見情形不對，就有二人出去告急，但走到門口被他們推回來，並且他們把二道鐵門也關起來了。幹部也被關到“飯廳”。只見顧平生被逼在一個牆角落裏，郝啓駿等指着他叫罵，又都回過身來，對着我們幹部叫罵，拍桌子，摔茶杯，摔香煙缸，用兩隻手合成喇叭的樣子，貼緊我們幹部的耳朵，拔直喉嚨，咆哮地叫喊道：“居民委員會假面具！”他們把幹部像玩皮球一樣推到東推到西。一會，裏面有人打開了“飯廳”的一扇小門，放出一種化學性的煙來，郝啓駿又用兩隻電風扇對着幹部吹，吹得這幾個幹部感到頭發昏，胸發脹。這時，郝啓駿威逼着幹部說：“你們要出去沒有介便當，要寫下紙頭來，承認居民委員會支持反宗教”。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周良志等竟猖狂地喊叫污蔑毛主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反革命口號。囂張跋扈，無甚於此！

我們決不容許這撮匪徒猖狂

居民委員會幹部被關在裏面，和外面割斷了聯繫。但我們還有一個幹部等在外面，等了好久不見有人出來，決定進教堂看看，走到門口，鐵門關着，裏面有三個人守住，拒絕開門，並撒謊說裏面沒有我們的幹部。這個幹部看到勢頭不對，就打電話報告派出所。不一會來了一位戶籍警。這時候，裏面亂叫亂喊的声响已傳到外面，附近的工人和居民多人已經聞聲趕到，一齊叫喊：“快開門！”他們堅持不開。戶籍警用公安局名義通知裏面開門，還是不開。當時就有唐松記玻璃廠、金同昌五金廠的三位工人，激於正義，覺得救人要緊，翻過牆去，把第一道門打開了，守門的人仍來阻止。門外面，羣眾怒不可遏，一致申斥他們說：“你們殺

了人，我們也不可以進去嗎？大家聽到喊救命的聲音，難道能見死不救嗎？”這時已是十時三刻光景，公安人員已經趕到。當公安人員走到“飯廳”時，裏面一夥人還在呼喊反革命口號，而郝啓駿等數人却在羣眾高喊開門的時候畏罪逃出去了。在羣眾的協助下，公安人員終於在教堂鐘樓最高一層的夾板中把郝啓駿、陳祖輝搜查了出來，當場押送公安分局加以拘留。張希斌一手佈置了這件駭人聽聞的反革命事件，事件發生的時候，他又在樓上。但當公安人員和他談話時，他竟做裝不知道，態度極為兇橫！

萬惡不赦的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披着宗教外衣，說什麼“超國家”“超政治”，難道我們能夠從這罪惡昭彰的反革命事件中嗅得出一點宗教的氣味嗎？難道這充滿着血腥氣的反革命事實，還不足以驚醒一切天主教徒和愛國人民嗎？除了別有用心的人，誰能不對這些反革命分子激起極大的憤怒！不徹底肅清這些反革命分子，我們人民，無論是有宗教信仰的或是無宗教信仰的，都不能過太平日子了，我們的建設成果就要遭到不可估計的破壞。

我們一定要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我們要求政府嚴懲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

上海市大通路培德里全體里弄幹部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日“解放日報”）

我要揭露沈潤卿、張維屏的反革命罪行

東昌區教友 許逢春

我是東昌區的教友，我要揭發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所作的罪惡活動，龔品梅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沈潤卿在陸家嘴共昌棧等地區慘無人道地把天真無邪活潑可愛的兒童拖進火坑裏。在一九五二年，政府接辦了陸家嘴達義小學及其昌棧培爾小學，廣大的教友莫不歡欣鼓舞，但反革命分子沈潤卿却在陸家嘴佈置一個十二歲的小朋友李培德，放火焚燒達義小學，由於學校教師戒備得好，放火未成；繼又迫使李培德去破壞學校門窗、電燈泡等等的一切用具，並威脅李培德不許告訴自己的父母。李培德心裏懼怕，就過江逃到上海市區來，流落在街頭，變成一個小癩三，後來把自己的絨綫衫也脫下來，賣了二元錢，以維持生活。他家裏的人急得了不得，東找西找的找了好久方才找到。像這樣的事情，只要是稍有良心的人都不會做的，而沈潤卿的所作所為是一個神長所應做的嗎？

還有一次，沈潤卿誘騙一個不滿十歲的兒童李國萍張貼反動標語，李國萍在他脅迫之下，把一張反動標語張貼在東昌路的碼頭口，一張貼在共昌棧的電鐘下面。此後沈潤卿又叫李國萍在人數不多也不少的地方呼反動口號。在其昌棧，沈潤卿直接指使反革命分子姚嘉華（他是共昌棧“公青”頭子），叫一個十三歲的兒童陸知勇去把“鎮壓反革命”的標語撕去一個“反”字，成為“鎮壓革命”，並發給粉筆唆使他到處寫“打倒共產黨”“打倒青年團”等反動標語。

沈潤卿的破壞活動是一貫的，是有組織的。解放以後，沈潤卿拉攏日偽時期當過和平軍上尉、忠義救國軍上海檢查站中尉等職務的反革命分子傅德福，又拉攏前偽其昌棧保衛團團長、開過賭台、佔人土地、強姦過婦女的惡霸許安祥等人，組織了一個包括反動軍官、地主、惡霸、流氓等人的反革命集團，企圖美蔣復辟，無法無天的進行其反革命的活動。

一九五〇年，沈潤卿在陸家嘴積極的組織反動組織“聖母軍”，不斷的拉攏教友加入，他自己擔任“指導司鐸”，一九五一年上海市軍管會頒佈命令取締反動組織“聖母軍”之後，他還在陸家嘴公開叫囂“聖母軍”不是反動組織，抗拒軍管會的命令，阻撓“聖母軍”分子退“團”，像陸家嘴地區“聖母軍”支會秘書葉青萍，就是被他打擊的一個。沈潤卿和龔品梅是一隻襖統管，所以以後他又秘密的組織了“公青”，把“聖母軍”的骨幹轉到“公青”去。

在偉大的土地改革時，沈潤卿就公開地不准教友分地主的土地，他說：“分到了田就是犯罪，因為地主的田是天主賞賜的。”抗美援朝運動中，沈潤卿費盡心機進行破壞，他說：“為什麼蘇聯不出兵，叫我們中國人去送死。”勞動就業登記時，許多因蔣匪搜括而工廠倒閉迫使失業的工人紛紛登記要求工作，而沈潤卿污蔑說：“救濟米就是糲衣砲彈，吃了就要上魔鬼的當，現在苦一些沒有關係，將來有甜的。”叫人家不要去登記。一九五三年一月，當政府接辦培爾小學時，這個反革命集團就派出反革命分子姚嘉華、嚴永德、張腹清等聚集二、四十個“公青”，衝進學校辦公室，企圖製造騷動事件，破壞接辦工作。

教友有一點愛國表現，沈潤卿就加以打擊，其昌棧有個姓姚教友，過去販賣白粉（毒品）的時候，沈潤卿對他說：“沒關係，可以領聖體。”後來這個教友受到愛國教育後，認識到販賣白粉是罪惡的事情，悔改了，

並且參加了里弄工作，參加社會活動，而在这時候，沈潤卿就威脅打擊他，不給他領聖體。販賣白粉可以領聖體，參加里弄工作不可以領聖體，在沈潤卿眼裏，善惡是非，不是已經完全顛倒過來了嗎？

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反革命材料公佈後，廣大人民都投入了為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鬥爭中去，而沈潤卿却百般地進行破壞，他公開說：“胡風我不認識他，所以我不能反對，我要為一總人祈禱，我也為蔣介石祈禱。”

我還要揭發和沈潤卿臭味相投、在東昌區胡作非為的 另一醜品梅反革命集團分子張維屏的罪行。反革命分子張維屏在解放前跟“教務協進會”裏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相勾結，擔任該會委員和傳教組組長，是國民黨偽上海市候補參議員。在那時，這個反革命分子的反共氣餒是異常囂張的，他在黃鐘播音電台上進行廣播，高喊：“共匪不滅，死不甘心”，“我們要消滅共產黨”。上海解放後他還不甘心，想長期的潛藏在天主教會內，繼續進行其反革命活動，因此他就與才爾孟、格壽平等帝國主義分子密切聯系，與醜品梅反革命集團的核心分子隋天祥勾結。張維屏經常收聽“美國之音”，散播謠言，在前磐石小學任“校長”時，把偽金圓券上的蔣匪像剪下來作為“獎票”，並放映反動幻燈片，毒害兒童。他在傅家天主堂內拉攏了一批惡霸、地痞、流氓、“三青团”等組織了一個反革命的小集團，其集團中的主要人物像彭惠利，即是一個大惡霸，傅嘉良是三青团區隊長，藍仲根是日偽的義務警察中隊附、日偽清鄉檢查所副所長，姜三福是地痞流氓。張維屏的反革命野心是異常瘋狂，異常堅決的。簡單舉一、二例：他們對各項運動都要破壞，在革命導師斯大林大元帥逝世時，張維屏不惜假借耶穌的聖名惡毒的講：“今天耶穌趕走了一個大魔鬼，其他小魔鬼也要慢慢的趕掉”，他並一再向愛

國教友表示他与共產党勢不兩立的态度，坚持其反革命的立場說：“要殺我头可以，要我擁護共產党就不可以。”

沈潤卿、張維屏把神聖的教堂作为他們進行反革命活動場所，他們不是在救人灵魂，而是在毒害我們的子女，推我們的子女進入火坑，我們每一个愛護教會的教友还能容忍这种無法無天的行为嗎？他們是帝國主義長期豢养的走狗，是蔣匪幫的忠实爪牙，我們必須把他們的宗教外衣剝去，看到他們反革命的真面目，把一切暗藏在天主教內的反革命分子徹底肅清。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七日“信鴿半月刊”）

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破坏土改、 破坏互助合作运动的罪行

洋涇區張家樓 張增祿

我是洋涇區張家樓世代相傳的一个老教友，当我看到九月九日的報紙，知道上海市公安局破獲了以龔品梅为首的暗藏在天主教內的反革命集团時，我心中是万分喜悅。这是全國人民在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鬥爭中的一个重大勝利，也是我們天主教界一个大喜事！現在，我要來揭發这批反革命分子的罪行。

土地改革時我在本堂听道，听到这样一句話：“天主賞賜我僉的东西，誰的即是誰的，这是天主指命，違背天主的义恩，这是有罪的”。當時受苦的農民紛紛要求訴苦鬥爭地主，而教堂內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的爪牙却說：“有苦向天主訴，不要鬥爭地主”，“参加了鬥爭就有罪，就不能

領聖體”。以後事實證明，凡是參加土地改革運動的教友，就辦不到神功，領不到聖體，並說參加土地改革的人，要在地主面前求寬容，在教堂做補贖，然後才能領聖體，企圖繼續讓地主統治我們。我們大家想一想，反動地主階級是農民的敵人，是壓迫我們勞動人民的，而反革命分子龔品梅集團分子却認為地主是好人，可以領聖體，辦神功。從這個例子就可以看出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龔品梅是有計劃地破壞我們人民民主政權，夢想使反動派勢力復辟的。

在美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朝鮮戰爭時，我親自聽到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分子造謠威脅教友：“從現在起，我們要準備三個月到六個月，因為這一段時期是黎明前的黑暗，應當忍受這些痛苦。”意思就是說蔣匪幫三個月到六個月就可以回來了。在反帝愛國運動開展時，我個人的宗教生活就被龔品梅的爪牙所剝奪了，他們不准我辦神功、領聖體。當時我的思想上真不通，我想我在解放初期，不參加社會活動，反而可以領聖體，現在，通過反帝愛國學習班學習之後，我參加了社會活動，却說我有罪，不能領聖體。請問大家，參加反帝愛國運動是有罪嗎？現在我明白了，我是沒有罪的，有罪的是隱藏在我們教會內的反革命分子，他們在破壞我們的宗教，有意識地打擊我們愛國教徒，他們收留了一些國民黨員、三青团員等壞傢伙，給他們過宗教生活，對我們善良的愛國愛教的教友倒不讓過宗教的正常生活，他們的行動是多麼毒辣！他們的手段是多麼卑鄙！

在農村中開展互助合作運動以來，廣大教友也響應這一號召，參加了互助合作組織，而反革命分子卻說：“參加互助合作是為物質打鬥，是有罪的。”更惡劣的是大約在一九五四年三月間，本村沈家宅教友因互助組提高到合作社，這樣做是完全有利於生產，有利於社員的。但隱藏

在天主教內的反革命分子却乘机造謠說：“共產黨要收回你的土地了，你們不能參加社，參加社是上了共產黨的當。”這些反革命分子就這樣造謠，企圖破壞我們農業生產合作社，搞垮我們合作社。一切愛國愛教的教友，把眼睛擦亮吧！被他們麻醉和欺壓的教友、神長們，趕快回過頭來，投入偉大的鬥爭中來吧！最後，我表示要團結廣大教友，站穩立場，分清敵我，把在天主教內的反革命分子全部肅清，為了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為了純潔我們教會，為了保衛人民幸福生活，我要向反革命分子鬥爭到底。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四日“解放日報”）

我愛天主教，我也愛祖國

蓬萊區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新育堂副堂長 陳夏珍

當我知道政府破獲了暗藏在天主教內的魏品梅反革命集團時，真有說不出的高興，我心裏幾年來一直想不透的問題終於有了答案。

解放以來，由於我站在愛國人民的立場上，參加了黨所領導的各項愛國運動，並積極與暗藏在天主教內的帝國主義分子作鬥爭，同時，又被羣眾選為區人民代表，特別是由於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國主義分子王方等反革命活動被揭發後，我在全堂工作人員大會上揭發了他們的罪行，因此魏品梅等反革命分子就對我懷恨在心，他們千方百計地對我加以迫害，如採取不讓我領聖體、辦神功的方法來折磨我。在聖母升天這一日，我到堂內望六時的彌撒，在神父送聖體的時候，他竟跳過了我不給我領聖體，我問他說：“我已經辦過神功了，為什麼不給我領聖體？”但

是神父理也不理我。我真氣憤極了，轉身就走。後來，在堂口遇到神父時，我向他提出質問，那知他惡狠狠地說：“因為你在大會上控訴了天主教，在信鴿報（天主教的報紙）上寫過文章，上面有指示，不能給你領聖體”。我氣憤地問他：“我揭發的是帝國主義分子，我是站在愛國愛教的立場上，難道這做錯了嗎？”大約神父也自知理屈，就跑開了。以後，他們採取了更惡毒的辦法來對付我，今年四月開四規時，我到伯多祿堂去領開四規的條子，誰知他們竟不給我，也不給我辦神功。起先，我還搞不懂為何伯多祿堂的神父和新普育堂的神父串通一氣，不約而同地對我進行迫害，現在才明白，暗藏在新普育堂的龔品梅反革命集團中的分子早已把我的情況向她們的“上級”作了詳細的彙報，這原來是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的陰謀詭計。

在我們堂內，不管那一個教徒參加黨和政府所號召的各項愛國運動，都會遭受到同樣的迫害。例如老教友張金林曾在大會上揭發過帝國主義分子奧地拉虐待嬰兒的罪行，神父不僅不給領聖體，還公開說“你是教徒中的壞榜樣”，強迫張金林做公堂補贖（即當眾悔過），然後才給他領聖體，用以破壞天主教內的反帝愛教運動。又如教友許升雲當選為區人民代表後，即領不到聖體，神父“忠告”她說：“你還是到別的區去領聖體吧，在蓬萊區你永遠也不要想領到聖體。”他們就是這樣卑鄙地採取這種方法來阻撓天主教徒熱愛自己的祖國，參加黨所領導的各項愛國運動，因而有些教徒就嚇得不敢參加各種愛國活動。

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口口聲聲說自己是愛教會、愛教規的，事實上，他們為了進行反革命活動，早已把教規拋在腦後了。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五建立聖體這一日，一清早，就有一批“公青”分子到我們堂口來大吵大鬧，一定要進來拜聖體（新普育堂是私堂，不招待外來教友），我們百般

解說，他們不聽，隨後大鬧一場始揚長而去。次日，我到伯多祿堂去參加耶穌受難禮節時，看到昨天搗亂的這批“公青”分子今早却在担任神父的附祭，這使我清楚地認識到原來他們的搗亂是別有用心。

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的活動是有策略的，他們惡毒地分化我和正堂長張心怡的團結，反革命分子常常偷偷摸摸地對我說：「你堂內的事情少做一些，讓龔（指張心怡）一個人去搞好了。」又威脅我說：「以後你在大會上少發些言，多發言對你自己是沒有好處的！」此外，她們還在教友中散佈「不看、不聽、不講」的二不政策，即要教友不看人民自己的報紙，不聽共產黨的話，不講愛國的言論，以此煽動教友來對抗共產黨。

對於一個虔誠的教徒說來，最大的恥辱莫過於不領聖體。我為這件事深深地感到痛苦，為什麼一個教徒愛自己的祖國，要承受這種不合理的恥辱呢？我憎恨教會中這種不合理的現象，但是又不了解他們對我和種迫害的目的何在。今天，我才認識到他們就是一羣披着羊皮的狼——全國人民所深惡痛絕的反革命分子。這更使我認清楚了我過去這樣做是正確的，無論他們怎樣迫害與打擊，我是不會被他們嚇倒的。我是一個新中國的公民，也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我愛天主教，但我也愛我的祖國。我決不允許這些反革命分子隱藏在我們天主教內，玷污我們神聖的教會，更不能允許他們披着宗教外衣來幹一些反革命勾當，破壞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我完全擁護政府的英明措施，而且有決心和全國人民、全體教友團結在一起，為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特別是暗藏在天主教中的反革命分子而鬥爭。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日“解放日報”）

是誰在摧殘一門三代的心灵？

聖母院院長 林曉明

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作为一个兒童工作者，我要揭發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对兒童們的摧殘和毒害！

只要講这样一樁事实就足够了：在永安小学有一位十歲左右的小朋友，他一門三代都是虔誠的教友。这天他第一次戴上紅領巾，跳跳蹦蹦回家來，把自己爭取到加入少先隊的喜訊告訴了老祖父和爸媽們，老祖父見了孫兒戴上紅領巾，喜得眉開眼笑，爸媽們也高兴不尽。

这位小孩子才戴了一天紅領巾，他的老祖父馬上接到了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的警告：快要你的孫子把“魔鬼”的紅領巾退回去，不然你們一家人都不准上教堂、不許領“聖体”！虔誠、善良的教友們，誰有接受教会这样嚴重的处分啊！

宗教感情濃厚的老祖父沒奈何，只得好言好語勸孫子把紅領巾退掉，可是孫子的紅領巾是努力爭取來的光榮，难道老祖父竟甘願他的孫子退掉紅領巾，不要做好孩子麼？小孫子也不肯退掉自己心爱的紅領巾，惹得老祖父光火、板面孔了，小孫子想不到親愛的老祖父竟這麼固执，他手裏緊緊提著心爱的紅領巾，禁不住放声大哭。誰知道孫子的眼淚却引來了老祖父和爸媽的眼淚，一家人哭成一团。小孫子再也不明白老祖父為什麼心腸這麼硬，当然更不会知道这是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披着宗教外衣在毒害小小年紀的他啊！

小孫子熱愛老祖父，但也熱愛紅領巾，为了不使老祖父動气，为了

能使一家人都能上教堂，同時也為了保持自己心愛的紅領巾，他，放學回家不戴紅領巾，却把它交給小朋友保存，只有到了學校裏，才戴上自己的紅領巾。這孩子，本來活潑可愛，但自從發生了這件事以後，他變得沉默、乖僻了，一個十歲左右的小孩子，背上了這麼一個想不透、解不開的思想包袱，他怎麼能擔負得了啊！

老祖父呢，也為了這事，苦惱得生病了。

是誰阻撓這孩子進步？是誰破壞了這個家庭的和睦、幸福？是誰摧殘了這孩子幼小的心靈？就是那披着宗教外衣的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就是這一撮聖母的叛徒、天主不容的反革命分子！

愛國的善良教友們，希望自己和子女們進步的虔誠教友們，我們緊緊團結起來，在共產黨、毛主席的領導下，提高警惕，擦亮眼睛，與我教的敗類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劃清界限，分清敵我，積極肅清一切隱藏在天主教內的反革命分子，為保護教會的純潔和孩子們的幸福而鬥爭吧！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一日“解放日報”）

逮捕了反革命分子龔品梅 好像搬去了壓在我心上的大石頭

聖母院育嬰堂總務股主任 潘雲芳

八日晚上，我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召開的天主教人士座談會。會上由負責同志向我們作了報告，他說，為了保護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維護社會秩序，純潔我們的天主教，政府再也不能容忍天主教內以龔品梅為首的那批反革命分子繼續放肆下去了。他

當時就向我們宣佈公安局已依法逮捕了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當我聽了這喜訊之後，好像搬去了很久就壓在我心上的一塊大石頭，我熱烈地擁護政府這一大快人心的英明措施，感謝政府代我們愛國教徒消除了悶在心中的冤氣。的確，自解放幾年來，政府對教會非常尊重，處處加以照顧；但以龔品梅為首的反革命集團，始終堅決地抱着狡猾、不忠誠的態度，抗拒和違反政府的法令，把政府的好心當作惡意。他們以為政府尊重教會是怕教會。他們說共產黨是怕鬼的。他們利用政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來向我們政府與人民得寸進尺地進攻，故意歪曲和侮辱政府的政策。例如，在一九五五年二月份我們聖母院育嬰堂開展領養，使院內的孤兒能享受到家庭的溫暖與父母的愛，這不是一件好事嗎？但是當時有一個反革命分子對我說：“這是多麼可惜的一件事，政府既然養不起這些孩子，那為什麼要從我們手中搶去呢？”大家想想看，政府為着這些孩子的幸福，開展領養，這些反革命分子就出來破壞，造謠歪曲，說政府養不起這些孩子。人民政府能免費供給許許多多大學生和中學生讀書，豈有養不起這幾百個孩子的道理嗎？以龔品梅為首的反革命分子還拉攏了許多青年作他們的犧牲者，他們甚至訓練一批“公青”分子，來瘋狂地向政府示威。例如在一九五四年，有一天根本沒有什麼占禮，但在徐家匯天主堂內不知舉行什麼大禮，是由龔品梅自己來主持的。我記得那天龔品梅坐着汽車前來，當他的汽車行到我們聖母院前面時，在大堂前的廣場上就放起爆竹來，許多“公青”分子瘋狂似地湧過馬路，呼口號，把整個交通都弄亂了。我看到這種情況，就覺得非常慚愧，為什麼我們教會內現在會有這種情況，而且還有這種教友呢？更加使我不能了解的，就是龔品梅他身為上海教區的主教，為什麼允許這些“公青”分子作出這種不合乎教友體統的行動呢？當時我是沒有明瞭這一點的，但現在

我的眼睛是擦亮了，原來“公青”分子的瘋狂活動就是龔品梅自己指使的，像龔品梅这样的人難道還是代表耶穌的善牧嗎？

以我本人來論吧，幾年來帝國主義和以龔品梅為首的反革命分子給我的打擊和給我受的冤氣真是一言難盡。現在我祇舉其中一兩件事實。一九五四年四月在我結婚前幾天，我和我的愛人周承祺去見徐匯修道院會長梅秉賦，要求他代我們婚配（宗教儀式的婚禮）。梅秉賦就問周承祺說，你的對方是誰。周承祺回說是潘雪芳。當時梅秉賦就拒絕說，不婚配。周承祺問他為什麼，梅說，對這個問題我們不加討論，我們只準備犧牲一切來应付她的，要是潘雪芳要婚配，那她必須要向廣大神長教友交代明白……。我听到了這些話當時很弄不懂，我想我又沒有什麼，為什麼他們要準備犧牲一切对付我呢？对付我什麼呢？當時我越想越不懂，但後來我認識了他這一句話的惡毒用意。他要对付的不是我一個人，因為我愛國愛教，揭露了他們的罪跡，因此他們敵視我，甚至說等美國人來了一定要把我捉到羅馬去公審。但是同我站在同一條戰線上愛國愛教的人是很多的，可想而知他要对付的並不是我一個人，而是廣大的愛國愛教的人民。他這種話證明他是甘願與人民為敵到底的。幾年來我受到以龔品梅為首的反革命分子的種種侮辱，說我什麼不走正路呀，糊塗呀，我在這裏真是一言難盡。但是我並不苦悶，因為我知道我看到的，是對的，是正義的，真理終是要勝利的。現在我們是勝利了，我看到了光明。今天我所揭發的並不是上海教區的主教，我揭發的是反革命分子龔品梅。我希望廣大教友們，對這一點要分清，今後一定要團結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周圍，堅決與教內的反革命分子鬥爭到底，不獲全勝，決不收兵。我們一定要在政府的協助下純潔我們的教會，使我們愛國愛教的信徒們都能自由地過宗教生活，自由地熱愛自己的祖國，同全國人民

起建設偉大的社会主义社会。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一日“解放日報”)

压在女教徒身上的大石头搬掉了

上海市民主妇联执委、天主教徒 袁蕴常

人民政府破獲暗藏在天主教內的龔品梅反革命集团，並依法逮捕了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這是一件人人稱快的喜事。我是一個女天主教徒，我熱烈擁護政府的這個措施。

在舊社會裏，我們婦女是最受壓迫、最得不到自由權利的。解放後，我們婦女有了和男子同樣平等的權利，參加各項社會活動，參加國家建設，政治地位大大提高。但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對我們婦女的翻身却絕對仇視。我們女教徒參加社會活動，他們就誣蔑說“男女混淆不清”；女教徒參加開會、讀報、學習，他們就講“女人只要管管家務好了，用不着管政治”。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利用教會職權，發出“不看、不聽、不講”的非法命令，好像一塊大石塊压在天主教徒的身上，尤其是使得我們女教徒透不過氣來。解放已經五六年了，在每次天主教徒羣眾性的愛國活動中，有的女教徒第一次去參加，就受到他們的打擊。大家都知道，我們做母親的責任是教育子女愛祖國、愛勞動，做一個好孩子、好學生，把自己的孩子培養成為建設社會主義的有用人才；但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却要教徒母親阻止自己的孩子參加少先隊，不讓孩子接受五愛教育。這不但影響兒童教徒身心健康的發展，也造成教徒家長的苦悶。我為我們女教徒切身所受到的痛苦感到極大的憤怒！俗語說：“白露裏的雨，到一處壞

一处。”用这个話來比方龔品梅反革命集团是很恰当的。因此，肅清龔品梅这个反革命集团，对祖國、对我们教会都是有利的。

政府是尊重我們天主教徒的，在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委員會中都有我們天主教的神長和教徒。一九五五年四五月間，江西、浙江、江苏、安徽、福建各省一百多位天主教的神長、教徒到上海來參觀苏联經濟及文化建設成就展覽會，我親眼看到政府熱烈地接待他們。對我們的宗教生活，政府從來也不干涉，龔品梅反革命集团說政府“干涉宗教信仰自由”，是毫無根據的。

龔品梅反革命集团是人民的敵人，也是天主教徒的敵人；肅清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对國家建設有利，同時也純潔了天主教會。因此，我們天主教婦女要緊密地團結起來，和全上海人民在一起，在共產黨、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徹底肅清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和清除暗藏在天主教內的一切反革命分子。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五日“解放日報”）

我要揭發，被陷害的修女不只是舒海雲

廣慈醫院護士 李月華

我在十一日的解放日報上，看到了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私設監牢、修女舒海雲被囚禁達十個月之久的消息。我相信每一個善良的教友見到了這種無法無天的罪行，都會產生無比的憤怒。現在政府已將反革命分子周葆英逮捕，使舒海雲恢復自由，重見天日。我擁護政府逮捕周葆英的正確措施，我為舒海雲修女的重見天日而高興！

我曾在重慶南路仁愛會做了十多年的修女，暗藏在教會內的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橫行霸道，對有愛國心和有正義感的中國修女的迫害，我是親身經歷過的。解放之後，我思想上有了轉變，他們就監視我的行為，不許骨肉至親、老師朋友來看我。有一次，我讀書時的先生來探望我，竟坐了三個鐘頭，無法見到我。後來我听了反帝愛國運動的消息，怦然心動，他們曉得後硬說我是共產黨「危險分子」，把我孤立起來，經常諷刺我、打擊我。我受不住他們的無理迫害，毅然離開仁愛會，跳出了他們的魔掌，可是我一直想念着別的被迫害的修女們。我曾親眼看到好幾位中國修女，因為表現了愛國心，敢於反抗他們的無理措施而受到迫害。如一位徐瑪加利大嬷嬷在抗日戰爭時期關心祖國的消息，就被帝國主義分子沙維愛（Savier）以「無聖召」為辭撤出了修會。又如一九四四年在廣慈醫院工作的一位陳嬷嬷生了病，「大嬷嬷」把她當做一隻狗也不如，丟在一邊不管，不給她吃藥，熱度高到四十度，「大嬷嬷」還是心如鐵石，視若無睹，不久陳嬷嬷就死去了，當時她只有二十四歲。這不過是隨時想起的一兩個事例而已。

反革命分子周葆英，我們過去一向知道她很兇，但她對「大嬷嬷」帝國主義分子包天真（La Porte）却是俯首貼耳、百依百順的，唯唯諾諾，通風報信，既卑鄙又無恥，因而取得了包天真的寵愛。當時我們敢怒而不敢言。周葆英嘴巴中鑲着隻金牙齒，我們就以「金牙齒」作為她的代號，在談話中一提到「金牙齒」就不言而喻，大家嗤之以鼻，作為我們反抗的一種表現。後來，帝國主義分子包天真把控制修會的「大權」交給了周葆英，於是她如虎添翼愈加無惡不作了。舒海雲修女不過對她的蠻橫行為表示了一點不滿，這個壞蛋就用土匪的手段把舒修女關到他們私設的監牢裏去。大家想一想：一位修女為了進會修道，而竟被如此殘酷反

革命集团折磨到如此地步，是可忍，孰不可忍！在一个以“仁爱”为名的修会内，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却幹出了这种侵犯人权、慘無人道的事情來，不能不令人髮指！龔品梅反革命集团污辱了天主，污辱了聖教會，刺伤了耶穌聖心。虧得現在是人民政府領導，不然的話，舒海雲修女將永無出头之日了。我要問問龔品梅反革命集团：舒海雲修女有什麼罪？你們有什麼權力，可以在修会内私設監牢，囚禁她？你們眼中还有天主的誠命和國家的法律嗎？

我要求政府嚴懲反革命分子周葆英，嚴懲龔品梅反革命集团，把他們从我們的教会中徹底清除出去。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五日“解放日報”）

是他們把我姑母当做瘋人關了十年

安当医院工人 陸 麟

在徐家匯，天主教徒們都知道有一位陸癡癡是“痴子”癡癡，她就是我的姑母陸月娥。

她是痴子嗎？不，她一點也不痴！五十九歲的她，如今由人民政府介紹到嵩山區联誼小学做圖書館管理員，她工作很好，誰也看不出她有絲毫痴呆瘋癲的地方。如果你和她談話，會發現她懂得很多新社会的道理，她从心底感謝人民政府对她的關懷和幫助。

她怎麼能不感謝人民政府呢！是解放軍解放上海的炮声一响，吓得帝國主义分子慌了手脚，才把她从關了九年半的瘋人院裏放了出來。解放以後，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又兩次把她關進瘋人院，又是人民政府把

她救了出來，當時為了避免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繼續迫害她，政府特地替她介紹工作，使她能過到一個幸福愉快的晚年。

她本來是好好的一個人，怎麼會幾次被關進瘋人院去的呢？說來話長。我們家裏世代是虔誠的教徒，我姑母在二十二歲那年就參加拯亡會做了修女，她“發愿”時，我家曾經送上四隻金元宝（每隻四五兩重）。教內的帝國主義分子對有錢的教徒是十分“客氣”的，那時我姑母也處處受到優待。我五歲以前就死了父母，七歲時又死了祖母，帝國主義分子一見我們先人留下那麼一大筆家財，眼睛就紅了，他們就把我家所有的財產都搜刮得乾乾淨淨，對我姑母說這些東西是“寄託”在他們那裏的；我呢，一個七歲的孩子却被他們硬生生地推進了帝國主義办的孤兒院，過着一天喝三餐薄粥的日子。

兇狠的帝國主義分子為了全部吞沒我家的財產，做得不露形跡，想出一條毒計，趁着我姑母悲痛亡母，整日啼哭時，便替我姑母加上一個“精神病”的帽子，剝去了她的“修服”，關進了瘋人院——普慈療養院。

她什麼病也沒有，醫生和護士也說她沒病，但是帝國主義分子說她“有病”，她沒病也得“有病”！在漫長的九年半裏，她就像真正的瘋人一樣，被看管着，監禁着，直到解放前夕。上海解放了，我有機會見到姑母，瘋人院裏九年半的監禁生活，摧毀了她的健康，她完全蒼老了。我一見她那衰弱的样子，禁不住哭了。她見了我這樣一個二十歲光景的青年，被帝國主義迫害得彎弓曲背，也流下兩行眼淚。她呆了半天，也仔細對我看了半天，才如從夢裏醒了過來，突然，她從角落裏找出一隻精巧的木盒子，鄭重地交給我說：“這是我們陸家的東西，你留着做個紀念吧。”我一時不明白她是什麼意思，她又緩緩地說：“這是我帶進院裏來的盒子，盒子裏本來是裝滿了金條、銀元等，我一個人都捧不動的；我從瘋

人院回來，盒子仍舊很好，可是裏面已經空空的了。”

我們家裏的財產是被帝國主義分子搶劫光了，但我們並不怎麼難過，因為到底我們是解放了，帝國主義分子先後被驅逐出境了，我姑母這個虔誠的教徒，能重新穿上修服，得到了宗教信仰的自由和人身的自由，她比什麼都快活，她感謝政府，她願意做個愛國愛教的教徒。

但是，這却大大觸怒了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他們懷着不可告人的陰謀，來對她進行迫害了。一九五一年的一天，我姑母感到有些頭痛，本來這是她老人家的老毛病，是常常發的，可是這一次被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知道了，他們便“小題大做”，表面上裝成非常關心的樣子，一定是我姑母進醫院，我姑母不願去，他們甜言蜜語說：“你那天病好，就別再讓你出院，一點也不就誤。”我姑母只得去了。臨走時，他們哄着我姑母脫去修服和十字架，這樣，我姑母又被送進了瘋人院。

瘋人院的醫生一聽她自己說的病情，不禁笑了說：“這算什麼精神病呀！你到外面看一看不就行了？上這裏來做啥？”醫生話是這麼說，但我姑母不敢不听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的話。她請求那些反革命分子讓她出院無效，只得住在瘋人院裏，一住又是六個月。後來在政府的支持和幫助下，她終於離開了瘋人院，回到院裏來。

隱藏在若瑟院的反革命分子一見她來，就威嚇她說：“我們都要解散了，你还回來做啥？你自己快想办法找出路吧。”我姑母是個信教虔誠的嬾嬾，當時已五十五歲了，她自己能找什麼出路呢？原來反革命分子妄想欺騙她，煽動起她對政府的不滿。我姑母不理會這些，請求她們發回“修服”，她們偏是留難不發，她們不僅利用這一套，重重地打擊和傷害我姑母的宗教感情，而且还進一步挑撥我姑母對政府的關係，說什麼這個世界，以後我們修女們都不穿“修服”，我們都要解散了，你還要修

服”做啥？

我姑母是一位幾十年的修女，毫無理由被取消穿修服，精神上痛苦異常。這一撮反革命分子還嫌幹得不毒辣，他們又趁一九五三年全國進行普選人口登記時，恐嚇我姑母，說什麼你的戶口還在瘋人院，你快上瘋人院去，不然就違反政府法令。

就這樣，我那老年的姑母又被送進了瘋人院。這一撮陰險毒辣的反革命分子妄想把她——這位愛國愛教的善良教徒活活關死在瘋人院裏。但是，現在是人民當權的時代，是毛澤東的時代，他們再也不能無法無天了。人民政府查明了這件事，特地請兩位醫生加以診斷。診斷結果，我的姑母的確沒有精神病，兩位醫生專門替她出了一張證明書，證明她沒有精神病，並且在口頭再三關照她說：“下次你再也不要來了。”

我姑母在解放前遭受帝國主義分子的迫害，解放後又繼續遭受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的迫害，她好好一個人，被當成瘋人在瘋人院足足關了十年零五個月！直到現在，她這個虔誠的老修女，還被橫蠻地剝奪了“修服”。

愛國的教徒們，善良的教徒們，全上海千千万萬的兄弟姐妹們，請你們看一看，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是怎樣繼承了帝國主義分子的衣鉢，殘酷地迫害愛國教徒，干涉愛國教徒們信仰自由這一神聖權利吧！我為我姑母，也為我自己，向這一撮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提出控訴，請求政府嚴厲制裁他們！（阿章記）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四日“解放日報”）

第一殘老院老人們揭發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的罪行

阿 章

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虐待我們老年人的罪惡說不完，訴不尽，我們要把苦水吐出來，讓人民替我們評理，請政府替我們撐腰！”上海市第一殘老院（原安老院）的老人們，讀了最近幾天的報紙以後，也憤怒地控訴了這一撮反革命分子，這些六七十歲的老伯伯、老媽媽，也受够了他們的虐待和迫害。

在水門汀上跪腫了膝蓋

一九五三年的年底，安老院內 聖母堂 的水門汀地凍得冰冷，有一天，就在这水門汀地上跪着三位白髮蒼蒼的老教徒，他們在當年足六十二歲的丁晚成、五十三歲的楊守仁、五十八歲的徐寶山。这天他們是被罰做“補贖”，在拜十四次“大苦路”。他們咬緊牙關，恭恭敬敬地跪着，足足跪了兩小時，拜完“大苦路”，三位老伯伯的膝蓋都跪腫了，六十二歲的丁晚成老伯伯，膝蓋上竟跪出了兩個瘤。人們會以為受到了如此重罰，三位虔誠的老伯伯總能求得“寬免”，領到“聖體”了罷！

“不行！”龔品梅反革命集團中的一個反革命分子乾脆地拒絕了他們的要求，說：“还得考察考察你們這幾個作‘妄証’的人！”

他們究竟犯了什麼重大的錯誤？作了什麼“妄証”呢？原來只是因為他們在宣判反革命分子的大會上講了話，講了擁護人民政府的話，揭發了一個反革命分子在院內所犯的罪行。這個反革命分子是龔品梅反革

命集團派到安老院裏來的，他們安排了一套鬼把戲，要這一反革命分子冒充政府幹部，到安老院裏來欺騙老年人，破壞政府的威信。陰謀很快就被揭穿了，政府對這一反革命分子判了刑。政府的正確措施受到了老人們的擁護，隱藏在院內的魏品梅反革命集團分子惱羞成怒，便濫用“神權”，向愛國老教徒們施行這樣的報復。

苛刻虐待愛國老人

安老院裏的老人們並不全是教徒，六十九歲的老伯伯劉順生就是位非教徒，是一九五二年十二月進安老院的。他在院內格外安分守己，生怕自己犯了“過錯”，觸怒那一撮“掌大權”的反革命分子。

但是，任憑劉老伯伯怎麼安分守己，他還是不知不覺地犯了“過錯”，觸怒了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分子是從一次談話中找到了他的“過錯”。

一天，那個反革命分子找了他去談話，問道：「你說人民政府好不好？」

“好，怎麼會不好呢？”劉順生老伯伯笑開了嘴，津津有味地談起來了：“人民政府一來，別的不談，光是修平馬路，我老年人走路不怕跌交，就是個好！還有物價平穩啦，捉壞人啦，造工廠啦，好處真正說不完。”

“這是政府表面的一套，你可不要上當！”

“怎麼會表面的？這全是我親眼目睹的呀。”劉順生老伯伯是位老實人，他見啥說啥。

這傢伙听了，黑着臉只是嚷：“你要落地獄，你要落地獄！”也不講明理由，便氣呼呼地走了。

這次談話以後，近七十歲的劉老伯伯便突然被派到豬欄間去做重

活了，每天从早到晚，这位走路也会跌倒的老伯伯，要替二十多头猪做清潔工作，光是水便要提幾十桶，反革命分子企圖累死他！做不了多久，他当真累得吐血病倒了。

“幸虧人民政府來接管了。”直到今天，刘老伯伯提起这事还為自己擦一把汗，說：“不然，我这条老命定会送在他們手裏！”

燒絨毯、劈紫檀桌

解放後，老伯伯、老媽媽們日夜盼着政府來接管，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便玩出一套冒充政府幹部來院的鬼把戲，妄想使老年人对政府失望，但是这一陰謀很快就被拆穿了，老人們还是盼着政府來接管。这一撮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嗅覺也很灵，他們感到事情不妙，便在院内開始了破坏工作：人民捐給老人們的絨毯、羊毛毯、布料等各种物資被他們偷运出去盜賣了。每晚往來的汽車不斷，到後來，連汽車也不知去向了。这一撮反革命分子天天造謠，說什麼人民政府要“消滅老人，要解散安老院，你們快自尋生路吧”。

天天俾听这些謠言，有些胆小的老人便上了他們的当，从院里逃出去流浪。這時，反革命分子更猖狂了，他們要把整个安老院都毀滅掉，他們用斧头劈掉了搬不走的紅木、紫檀木的各式傢具，把它当柴火燒；用鉄鋸把庫裏的鉄床鋸成廢鉄；把來不及偷走的絨毯、布料等燒成灰燼，最後他們还要動手砍倒院内所有的樹木。但是政府接管的幹部制止了他們的暴行，搶救出了一部分物資，保全了安老院。

“究竟是誰要消滅我們老人，破坏我們的安老院，我全都看得一清二楚！”六十歲的徐宝山老伯伯說：“我們堅決要求政府嚴办这批殘害我們老人的魔鬼！”

殘害老人的魔鬼

說這一撮反革命分子是殘害老人的魔鬼一點也不過分，這一撮反革命分子是繼承了帝國主義分子的衣鉢來殘害老人的。五十五歲的楊守仁伯伯會親眼見到也曾親身受過他們的迫害，只要聽一聽他的控訴就夠了。

“政府接管之前，我們在這裏那是養老？我們是在做長工呀，我和丁晚成及另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伯伯‘小嘉興’種二十畝菜地，每天要挑一百多斤的糞肥，我和丁晚成還勉強能挑，那位七十多歲的老伯伯走一步歇一歇，气喘得像拉風箱，我看不過意，去替他求情，他們叫我多管閑事，還說：‘他不幹就替我滾，找一百隻狗為難，找一百個老人容易，’這位七十多歲的老人就活活被折磨死了。

他們比惡霸地主還刻薄！我們種地流汗，一天做到兩頭黑，每頓只給淺淺的一碗飯，天天餓得頭昏眼花，手脚發軟，但還得替他賣命幹，像我們這樣的長工，天下到那裏去找啊！

我們愛國愛教，我們靠攏政府，他們就罵我們‘魔鬼’，不替我們‘開四規’，他們才真正是魔鬼！人民政府捉了他們，我們老人心也鬆了，我們從心底感謝人民政府，人民政府一定要重重地懲罰他們，千萬不能放過這批魔鬼啊！”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五日《解放日報》）

老年教徒的憤怒

第一殘老院六十歲老人 徐宝山

我是第一殘老院的老人，今年六十歲。我代表全院的老伯伯、老婆婆、全体教友來揭發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在我們院裏所進行的反革命活動。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分子黃華披着宗教外衣利用神权來壓迫我們教友，他是一貫反對政府、反對人民的，不准我們教友愛國，不准我們教友看進步的報刊書籍，如果看了給他曉得，就要不准領聖體。現在我把他在我們院裏做的幾件比較大的反革命活動談一談。

第一是破壞普選運動。在普選運動中，他就不給我們担任選民小組長的老伯伯領聖體办神功。

第二，反革命分子傅友貞到我們院裏冒充政府幹部，進行反革命活動，被公安局逮捕，被法院判處管制。當政府工作人員要到我們院裏來宣判管制的時候，黃華在會前就對我們一些老伯伯老婆婆講，在會上大家不准拍手，不准舉手，不准講話；如果啥人不聽話，就不准領聖體、办神功，但是我和丁晚成等老人在大會上揭發了反革命分子傅友貞的惡行。第二天早上黃華就找我們講話，他說傅友貞是好人，政府冤枉他，請我們犯“妄証”罪，要我們拜火苦路，還不准找門办神功、領聖體。

第三，去年開四規的時候，我們有二十多個人被停止办神功領聖體，因為我們愛國。

第四，平常黃華利用講道办神功時進行反動宣傳，說我們是毛世

界，过的是猫狗生活，並且叫我們教友要勇敢，不要怕，人民政府不会处分老人的。

这次政府依法逮捕了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我們院裏全体教友一致擁護。我們教友要求政府幫助我們肅清一切披着宗教外衣的豺狼，这样我們教友的宗教信仰才能得到保障。我們教友要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加強團結，擡亮眼睛，協助政府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人民的幸福生活，我們老人才能早日看到社会主义社会。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五日，年，日，月)

天主教的爱國青年！積極投入鬥爭中來！

上海市民主青年联合会执行委員 陈尚修

当我听到上海市公安局根据確鑿証据逮捕了以龔品梅为首的暗藏在上海天主教內的反革命分子的消息的时候，我非常高兴，我认为政府这件事办得很对，很好，我是一个爱国爱教的天主教青年，我完全擁護政府这一正確的措施。

廣大善良的天主教友、特別是我們青年教友，解放以後，看到自己的祖國一天比一天富強，我們很高兴，因此越來越熱愛自己的國家，團結在自己政府的周圍。但是，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对教友的爱国心，刻骨入骨的。这批反革命分子千方百計地阻撓和压制我們教友爱国活动，他們用‘不准領聖体’、‘絕罰’、‘公堂褫職’等種種手段阻止青年教友参加軍事幹部学校和少年先鋒隊，不在簽名反对龍函戲，發動年

生不聽政治課，不許參觀“蘇聯經濟及文化建設成就展覽會”，不許看進步電影。

一九五四年，上海組織了一個天主教友訪問團到南京去訪問，我也參加了。我感到南京的教友和人民政府團結得很好，所以，回到上海以後，我就把這種情況告訴了周圍的教友。我也建議上海教會應該改變態度，靠攏政府，龔品梅不但不理，還威脅我不許“領聖體”。

一九五五年五月裏，我和幾十位青年教友參加了上海市第一屆青年代表大會，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分子又照例出來進行破壞，有些參加了青年代表大會的青年教友也遭到不給“領聖體”的處罰。當我被選為上海市民主青年聯合會執行委員後，有人來通知我說：「主教要你辭掉上海市民主青年聯合會執行委員的職務。」我說：「這是大家選舉的，我不願意辭職。」龔品梅就進一步地威脅我：「一定要去辭職，如果辭不掉，就不要去參加任何會議。」這個時候，龔品梅就赤裸裸地對我說：「不管那一個組織，只要裏面有一條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天主教徒就不能參加。」當時我感到龔品梅這些行為實在太無道理，就對他說：「參加民主青年聯合會組織和宗教信仰完全沒有什麼矛盾。」人家想一想，現在每一個中國人民不是都在為建設社會主義而工作着嗎？我們天主教友也是中國人民，誰不希望自己的國家繁榮富強！龔品梅的存心究竟是什麼呢？現在事情完全搞清楚了。原來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是一夥在帝國主義間諜特務分子指揮下，披着宗教外衣，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反革命罪惡活動的黑幫，他們是帝國主義豢養的忠實走狗，是祖國的叛徒。

天主教的青年教友們，清除暗藏在天主教內的一切反革命分子，是每個教徒應有的正當行動，人家應該積極參加到這個鬥爭中來。一切參加過反革命活動的人，都應當徹底交代，有錯認錯，站稳人民的立場，劃

清敵我界綫。應該認識到保護宗教信仰自由和反对披着宗教外衣進行反革命活動的界綫。因为反对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並不是反对宗教，相反的是保護宗教，所以我們应当从这次事件中來吸取經驗教訓，覺悟過來，擦亮自己的眼睛，認清事实的真相，为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堅決鬥爭到底。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日“解放日報”)

我跳出了反革命泥坑

上海第二医学院学生 王守達

我是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学生，是一个“公青”的核心分子，也做过反動組織“教理小組”的小組長。我在龔品梅反革命黑幫的毒害和利用下，曾經進行过一些背叛祖國、不利於人民的活動。通过这次肅清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的鬥爭，我在共產党的耐心教育和幫助下，認清了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本質和他們毒害青年的罪行，終於跳出了反革命的泥坑。

我衷心擁護人民政府逮捕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的措施，这是保障社会主义建設、純潔我們教会、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挽救我們受毒害的青年教友的正确措施。龔品梅反革命集团曾經用“宗教活動”來掩盖他們不可告人的罪惡勾当。从我和很多被毒害的青年教友所看到的事实，鉄一般地証实这个反革命集团所進行的活動完全不是什麼宗教活動，而是叛國殃民的反革命活動。

一九五一年九月，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在帝國主义的指使和資

助下，組織了在上海各大專學校內的徐州青年天主教友的反動組織，每兩星期集會一次。反革命分子用請吃飯等小恩小惠來收買參加集會的青年教友，並且阻止他們參加愛國活動。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分子在集會上挑撥我們說：“目前我們沒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一九五一年十月八日，政府取締反動組織“聖母軍”後，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阻止“聖母軍”分子去登記退團，並叫教友不承認“聖母軍”是反動組織，如果誰敢去登記退團或者承認“聖母軍”是反動組織，誰就被評為背教，而被停領聖體。以後，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就在帝王堂召開了前震旦大學“聖母軍”分子的秘密會議，決定用“神修”、“傳教”等形式來逐漸恢復“聖母軍”的反革命活動。所謂“神修”就是參加這個秘密會議的“聖母軍”分子，在每星期五下午上課前半小時，在伯多祿堂集體拜苦路，來紀念這次被捕的反革命分子；而所謂“傳教”就是大肆造謠、污蔑人民政府的宗教政策。

自一九五一年以來，龔品梅反革命集團一直利用“教理小組”、“教理大組”、“教理大課”等反動組織來毒害青年教友，唆使他們破壞政府所号召的各項政治運動。“三反”、“五反”運動時，反革命分子陳雲棠、朱樹德指使“公青”核心分子緊急佈置全校“公青”，要他們藉口震旦大學是教會學校而反對做“三反”的清查工作。思想改造時，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分子指使“公青”分子在思想改造學習的小組會上如何和進步同學爭吵，而在反動的“教理小組”會上則互相交流對抗思想改造的“鬥爭經驗”。

一九五二年下半年，上海第二醫學院建院以後，龔品梅反革命集團通過反動的“教理小組”、“教理大組”向原聖約翰大學醫學院和原同德醫學院的“公青”分子介紹在原震旦大學的“公青”分子破壞政治運動的經驗，還介紹班級裏黨員、團員、團支書、团支部委員、積極分子、愛國教

友等人情况。一九五三年五月，本市展開反帝愛國運動前夕，製品梅反革命集團分子朱樹德秘密地召集了第二医学院的“公青”教理小組小組長以上的聯席會議，叫囂“教難”來了，唆使“公青”分子到政府破壞帝國主義間諜的現場去搗亂，向政府無理取鬧，要“公青”分子“不投降、不妥協、不出賣”。製品梅親自主持為帝國主義間諜拜大苦路。

一九五二年二月，全世界勞動人民的導師斯大林逝世的時候，製品梅集團的反革命分子朱樹德等竟得意忘形，並阻止“公青”分子帶黑紗和參加追悼會。但是當反革命分子張伯達病死獄中的時候，他們却叫“公青”分子參加“光榮彌撒”，並且分發黑紗。從這件事可以看出這一批黑幫是恨什麼人，愛什麼人了！

普選的時候，反革命分子陳雲棠的小修院內有一個破壞普選的反革命分子被市公安機關逮捕了，陳雲棠就說，“我們修院裏有一位弟兄響應了基督的号召，這是我們修院的光榮。”原來陳雲棠所謂的“響應基督号召”就是要青年教友進行反革命活動而被關進監獄。

鐵的事實證明，製品梅反革命集團唆使“公青”分子所進行的活動，不是什麼宗教活動，而是反革命活動。製品梅等根本不是什麼“主教”、“神甫”等神長，而是面目猙獰、黑良心的祖國的叛徒，是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我因為過去受毒害太深，所以在這次肅反運動開始的時候，還不肯徹底交代，錯誤地想做“致命聖人”。但是經過共產黨和學校行政上耐心地幫助，用事實說明政府的政策，才使我打破顧慮，徹底坦白交代了自己的問題。我交代以後，黨和政府表示歡迎，把我分配到醫院進行生產實習，還把人民醫師的榮譽給了我。通過我親身的經歷，我深深地感到共產黨的政策是偉大的，是真理。我也很慶幸我的學生。我希望過去像我一樣被製品梅等反革命分子所毒害和利用而誤入歧途的青年教

友們，快快覺悟過來，認清是非，站穩愛國立場，大膽地揭發和檢舉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的罪行，將這批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清除出我們純潔的聖教會！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六日“解放日報”）

我痛恨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毒害了我兩個兒子

崑山區教友 熊秉辰

我是一個有九個孩子的父親，兩個大的，一個名叫熊國良，現在徐匯中學唸高三，一個名叫熊膺華，在一九五三年反帝愛國運動中，被第二醫學院開除了。想起過去的事，我就痛恨龔品梅反革命集團。

記得在一九五三年反帝愛國運動中，我積極投入了這個鬥爭，我的兒子國良，那時不滿十七歲，却在同學面前，公開反對，竟敢說出他和我——他的親生父親——“勢不兩立”。當時有人還以這句話來諷刺我，打擊我。我現在明白了是什麼人給了他這個膽，教他這樣忤逆，這都是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平日給青年教友灌輸反動思想毒素，才使這班青年連骨肉也不認得了，天主十誡第四誡，命人孝敬父母，愛護祖國，而他們教青年與父親與國家“勢不兩立”，這是傳天主的教嗎？

說起我的兒子熊膺華，受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的毒害更是嚴重，也更可憐。他是舊震旦大學醫藥系的学生。震旦新生後，改名第二醫學院，他繼續讀到一九五三年。那時他已讀完了四年級，只要再讀一年，他就可以踏上工作崗位，為祖國服務。那曉得這批反革命豺狼，抓住了他不放鬆，用歪曲了的道理：什麼“神修”呀，什麼“幫助傳教”呀，什麼“聖堂服

务”呀，这些甜言蜜語來哄騙他，外表看來，是一个教友青年可以 做而且應該做的。可是什麼是他們的‘神修’呢？冷淡國事，舉凡國慶日及一切愛國運動節日，他們就叫這些青年集合堂內，或往余山“避靜”，使青年們不能參加遊行等等活動。他們叫教友青年怎麼‘幫助傳教’呢？就是叫他們向兒童們灌輸反共的思想毒素。在聖堂內“服務”什麼呢？是叫他們監視愛國教友，不給領聖體，打擊愛國教友。我的兒子就是这样和許多“公青”一樣，被他們麻醉後，逃避開會，逃避政治課，不參加任何愛國運動，听大報告竟溜出會場。最嚴重的是一九五二年反帝愛國運動開展時，一批所謂‘公青’（我的兒子也附和在內）竟集体走到學校青年科“示威”。因为这一系列的不法行動，我的兒子和不少別的同学就被學校開除了。開除後，我的兒子覺得对不起父母，又眼看自己的前途喪失，也很覺痛苦。全家为他也不由得掉淚。可是誰把我兒子的前途这样葬送了呢？今天龔品梅这夥反革命分子落了網，这不是他們罪有應得麼？还有更可恨的，就是这批反革命分子，看見这許多青年学生遭受了这样人的犧牲，他們还想繼續對他們進行欺騙。稱他們‘为天主受磨難’，叫他們‘要有勇气’，並警告他們“無論如何不得控訴神長”。因此我的兒子吃了这样大的虧，也不敢出一句怨言。我的兒子是一个痛恨蔣匪幫的人，在解放前的反飢餓反內战的運動中，他總是參加震旦高中生示威遊行，又參加當時一連串遊行集会。就是这样一個有愛國熱血的青年，在解放後却被龔品梅这夥殺人不見血的反革命集团毒害了，他們用包着宗教糖衣、內藏反動毒素的歪曲教义，麻痹了我的兒子和許多教友青年。這裏我要舉出他們慣常用來欺騙青年的鬼話，而同時要戳穿这些鬼話的荒謬。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平日總以“小宗徒”的称号送給这些教友青年，叫他們“勇敢反抗，準備救命”。可是耶穌向宗徒說過，“你們要多做善事，

好叫教外人看見你們做的善事，來光榮你們的在天聖父。”這不是說得很明白麼？傳教，使教會廣揚，最好的方法，是用好的行事來感動人心，使人讚揚我們教會。而這批反革命分子唆使青年做出許許多多反人民的坏事，引起全國人民的公憤痛恨，這是幫助傳教呢，還是敗壞教名？再說致命，耶穌明白地指出：“為義而被害難，乃真福。”可見，為“義”而被害難，才算得致命。如果是為了不義即不應該做的坏事，而被人民處理，也能算是致命嗎？試問這批反革命分子，縱使“公青”監視愛國教友，破壞政策，對抗政府，哪一件是應做的事呢？我耐心地将這些道理教育我的兒子。我也希望教會內一切青年記住耶穌的話，祂說：“我的羊認識我的聲音，也只聽我的話。”我們是耶穌的羊羣，我們就得辨認祂的聲音。就是要做好事，不要做反革命坏事。耶穌又說過：“凡不依照耶穌的道理，而用迷人的邪道，走進羊圈的，就不是好牧童而是羊賊。”我們要能辨認耶穌的聲音和羊賊的謊話，才不致被他們所把持、竊走。

魏品梅反革命集團欺騙利用教友青年的事實，實在一時講不完，正好像我對他們的痛恨，也是說不盡。我要好好教育我的兒子，叫我受了害的兒子明白，這批反革命分子仇恨新中國，我們就更要愛新中國；反革命分子要破壞我們社會主義建設，我們就要把祖國建設得更美好、更幸福。魏品梅等反革命分子想在青年身上施行陰謀毒害，是枉費心機的。終究我們還是在高呼着他們所不願意聽的口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毛主席萬歲！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九日《新華半月刊》）

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毒害了我們家中四個青年

盧灣區 胡鏡水 童瑞娟

提起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我們有切膚之恨。

我們兩人雖不是天主教徒，可是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的魔爪一直伸到了我們家庭裏，他們毒害了我們的四個妹妹——胡美珍、胡美玉，使她們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作為愛國的公民，我們完全擁護政府依法逮捕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

我們現在完全明白了，以龔品梅為首的這批反革命分子，是受帝國主義和蔣匪幫指使的，他們仇恨人民政權，積極破壞人民革命事業，迫害愛國教徒，毒害青年少年，把他（她）們拉入反革命的泥坑中去，斷送青年、少年們美好的青春和光明的前途。我們家庭中的胡美珍、胡美玉，就是受了這批反革命分子的利用，參加了他們的反動組織，進行反人民的活動，墮入到反革命的泥坑的。更惡毒的是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分子指使她們抗拒“聖母軍”登記，抗拒幾年來政府對她們的耐心教育，反對我們給她們的勸告，直到最近，政府指出她們的反動行為，給予最後坦白悔改的機會，家中人也尽力啓發幫助，可是她們因受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的毒害極深，仍然抗拒到底。這些反革命分子甚至連親生的母親和兄嫂都不認得，我們六十四歲的老母親勸她們向政府坦白，她們對母親說：“到提籃橋（指提籃橋監獄）去是光榮，槍斃更光榮。就是你母親死在我們面前，我們也不悔改。”她們還罵嫂嫂是‘魔鬼’。又說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的面目就是這樣醜惡！

龔品梅反革命集團不僅使胡美珍、胡美玉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連我們的女兒胡吟秋和外甥女翁芙英也受了他們的毒害。我們作為做父母的人，更衷心感激政府對青年的挽救。我們的女兒胡吟秋原來在讀書時受有反革命分子的影響，初三畢業後，我們就叫她考市立第二女中，設法使我們的女兒擺脫反革命的影響，結果考進了，可是胡美珍、胡美玉這兩個反革命分子，仍舊把她往火坑裏拉。我們的外甥女翁芙英從一九五三年住到我們家裏來以後，也受了這兩個反革命分子的影響，被她們拉下水去。說起這些事情來真恨煞人！

起先我們祇認為她們不像個好的青年學生，做事不正派，現在我們才更加認清了她們原來是幹的不可告人的反革命勾當。我們痛恨以龔品梅為首的這些反革命分子，我們要求政府嚴厲懲辦他們。從這次事件，我們更体会到政府政策的正確和偉大。我們要站穩立場，百倍地提高警惕，堅決地投入肅清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和一切潛藏反革命分子的鬥爭中去！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五日“解放日報”）

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怎樣毒害了我

華山路小學六年級學生 王春斗

我是一個天主教徒。在我九歲的時候，媽媽就死掉了，爸爸把我送進了徐家匯土山灣孤兒工藝院。我今年雖然只有十五歲，但是已經在孤兒院裏受盡了龔品梅反革命分子的毒害。現在我向各位小朋友談談我在孤兒院裏聽到見到的一些事情。

孤兒院裏指導我們唸經、管理我們生活的獻堂會的先生傅納寶，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就是通過她來毒害我們的。每當唸經和上自修課時候，她就教我們仇恨共產黨，不愛人民政府。抗美援朝時候，院裏有兩個同學參加了志願軍，她同我們說：“美國人在朝鮮打仗，有聖母在天上保佑他們，美國人馬上就要打到中國來了。”又說：“這批參軍的同學都是共產黨，將來他們回來要殺我們天主教友。共產黨是魔鬼。”有一次，反革命分子陳西還帶我們到楊樹浦那邊一個教堂去玩，一面請我們吃餛飩，一面告訴我們許多破壞“三反”、“五反”的壞話。他在上聖經課時向我們說，“共產黨要殺教友，燒教堂，滅教。”在他們的毒害下，我小小的心裏就害怕共產黨，怕和工作同志接近以後會變成小魔鬼。

反革命分子看見我年小不懂事，就利用我去罵人民政府，侮辱進步的同學。一九五一年，我們院裏的帝國主義分子程萬里等被捕時，傅納寶指使我們和公安人員搗蛋，叫我們罵公安人員。當時，校內工人画了許多漫畫，反革命分子就指使我們去偷偷擦掉、撕掉，甚至強迫一個同學對着漫畫叫反動口號。“五一”國際勞動節時，反革命分子不准我們參加遊行，院內吳寶貴、陳小毛參加了遊行，她們就叫我們罵這兩個同學是“魔鬼”，還不准他們吃晚飯。

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還怕我們不相信共產黨真的是“魔鬼”，就惡毒地指使傅納寶裝了魔鬼來嚇唬我們。一天夜裏，我們都睡了，傅納寶披頭散髮，挾了一隻枕头，拖了拖鞋跑來說：“我看見一個紅眼睛，紅嘴巴，頭髮直拖到地上的魔鬼，這個魔鬼對我說：‘你假使跟共產黨走，我要拉你入地獄。’幸好我不相信共產黨，天主保佑我。”這時候，我們都是八九歲的小孩，嚇得直發抖，我這一夜小便也不敢下床，蒙了被頭抖了一夜。過了幾天，我半夜裏醒來發現不知誰在我身上蓋了兩層被頭，又

有一样重的东西压在我的身上，我害怕死了，想魔鬼真的來拉我下地獄了，身上一陣陣地出冷汗。我揭開被角，看見一個長頭髮的人像殭屍一樣地跳出去。从这件事以後，我胆子嚇小了，夜裏不敢一个人走路，夜裏看見一隻貓就当作了魔鬼。现在我明白了，这都是反革命分子裝出來的，他們倒是真的毒害我們兒童的惡魔鬼。

反革命分子，不但在思想上毒害我，还从生活上來虐待我們。在孤兒院裏，不准吃飯，罰跪是家常便飯。傅納宝每天要我們背很多經，我們八九歲的小腦袋那裏記得牢，把頭腦也讀昏了，背不出就不許吃飯。反革命分子還窮開心地想出了一套體罰的名堂，他們把戒尺、藤条叫做“大餅油条”，把用手擰人叫做“巧克力”，把拉耳朵叫做“吃餛飩”。

我清清楚楚地記得，有一次，不知那一个小朋友把小便溺在地上，傅納宝就拿了一把半寸厚的戒尺，叫那个小朋友出來承認。我們平時看見她就像看見老虎，那个小朋友当然不敢承認，傅納宝便惡毒地命令我們幾十個小朋友都跪下來，把地上的小便舔乾淨，還威脅我們說：“誰不舔，誰就不許吃夜飯。”上面講的還只是幾個例子。說起這批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我們孤兒院的小朋友兩天兩夜也訴不完。

以前，我怕她們打我罵我，不給我吃飯，很听她們的話，不相信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现在我清楚了，我从小吃這麼多苦，而且到現在还不進步，看見別的小朋友戴上了紅領巾，只好眼紅地對他們望望，這些都是醜品梅反革命集團這批惡魔鬼害我的。我要求政府嚴厲懲辦這些反革命分子，為我們受害的小朋友報仇。（章劍平記）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六日“解放日報”）

我参加了少先队，反革命分子就来打击我！

瞿怀仁

我今年十二歲，在徐匯區中心小學讀書，是个少先队员。因为我全家都信天主教，所以我也是个小教友。想起來，为参加少先队的事，我吃过多少虧啊！現在，我要揭發出來。

一九五五年三月裏，一天下午，學校裏舉行入隊儀式。當大隊輔導員蕭琪發下紅領巾，隊員黃育林把它紮在我頸項上的時候，我心裏多快樂！現在我和其他小朋友一樣，戴上光榮的紅領巾了。有人要說我“落地獄”，讓他們說去！

第二天課餘休息時間，同學孫蓮嘉看到我的紅領巾，就板起面孔問：“你入隊了？”又說：“天主教勿好入隊的！”（你們還不知道孫蓮嘉是什麼人，最近被政府捉去的反革命分子陳西同他頂要好，時常鬼鬼祟祟地教他壞主意。所以，他的功課頂壞，門門不及格。）馬上就把身子側過來撞了我一下，又朝着我心口打了一下。

散學後，我剛出校門，孫蓮嘉就指揮幾個小朋友，一齊拍手跺腳罵：“紅領巾，害人精！”又罵我“三角褲！”我不理他們，只管自己走路。

後來，孫蓮嘉越來越是捉弄我。有一天課時間，他無緣無故對我嘴巴上打了一拳。啊呀！嚇了我一跳，只覺得嘴巴裏流着一種鹹鹹的東西，用手帕揩了一揩，是血！小朋友們都叫：“瞿懷仁，你的下嘴唇皮破了口子！”我知道他們打我罵我，是叫我不要進步，不要參加少先队，但我偏要參加少先队，也一定不怕他們的打擊。

六月一號，學校裏要辦一個營火會。早起，我就看見孫蓮嘉他們拾石子。我想，坏人一定教他們破壞營火會了，我要注意，還要報告老師。後來却忘記掉了。到晚上開會時，我只顧看戲，更加不記得這件事，忽然，“拍搭！”一塊小石子落在我們身邊，馬上又是好幾塊，孫蓮嘉他們还把點着的洋火彈到我們身邊來，一面又叫：‘失火了！失火了！’幸虧老師們來了，他們才散。

我想，這些事情，不是孫蓮嘉他們自己敢跟我作對（入隊之前孫蓮嘉並沒有打過我），一定是有人教他們打我罵我的。什麼人教的？就是反革命分子陳西。陳西是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的分子，他不准我入隊，不許我進步，老早不許我領聖休，又教人打擊我。但是我曉得，他這是反革命的做法，我不怕他們打罵。我願意政府把陳西捉去。今後，我要做個好少先隊員！（王魯記）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六日《解放日報》）

只有清除教內的反革命分子， 才能享受真正的宗教自由

上海市新聞路第一小學教師 **蘇慧珍**

我在解放日報上看到了上海市公安局破獲了暗藏在上海天主教內的以龔品梅為首的反革命集團的消息後，作為一個中國人民、愛國教徒，對人民政府採取這樣堅決的措施，我感到了由衷的喜悅，並表示熱烈的擁護。

我們學校過去是一個天主教會辦的學校。校中有很多老師都是皮

滅的天主教徒。學校的隔牆就是大通路教堂。披着神甫外衣、暗藏在這個教堂內的反革命分子張希斌，經常利用宗教進行各種反革命陰謀破壞活動，利用神權來打擊愛國教徒，動不動就用“開除教籍”“擯神權”“停領聖體”“停辦神功”等來阻撓教徒的愛國行動。我們學校中有一老年教友，有一次他參加了一個天主教友愛國運動座談會，回來後到天主堂中辦神功，反革命分子張希斌就利用神權威脅他說：‘為什麼你要去參加這種會，是不是你們校長用手槍逼你去的？’隨即停上了他領聖體，剝奪了這個虔誠教友的宗教權利。諸如此類的事情是相當多的，由此造成了這些愛國教徒思想上極大的痛苦，不敢公開參加各種愛國運動，更不敢和反革命分子展開鬥爭，阻礙了他們的進步。

張希斌還惡毒地進行挑撥離間，從思想上來毒害教徒，使一些認識較模糊的教徒對政府採取了不信任和公然對抗的態度，有的買了“斬斷魔爪”等反帝愛國內容的電影票却不給去看，有的到了“反帝愛國展覽會”會場門口又退回去。反革命分子說：“這一切都是假的，是人民政府偽造出來陷害他們的。”這樣影響了教徒和政府之間的團結，也造成了教徒與非教徒之間的隔閡。

更可惡的是這些反革命分子還把他們的魔爪伸向我們祖國的下一代的身上，利用一批“公青”分子來向兒童威脅，不准他們入少先隊，說“這是魔鬼的組織”，誰加入少先隊，全家就不能領聖體，本人還要受到侮辱。另一方面，他們在教堂內購置了很多玩具和點心糖果等，用這些小恩小惠來引誘兒童到堂內去，有意識地向兒童進行反革命的宣傳，用反動思想來腐蝕這些兒童的純潔的心靈，使這些兒童仇視政府，不愛祖國，不好好學習；甚至仇視進步教師，上課調皮搗亂。反革命分子就是以這種毒辣的方法來破壞人民教育事業，挖社會主義的牆腳的。

以上事实都說明了这些反革命分子根本不是什么天主教內的平教和神長，而是披了宗教外衣的帝國主义走狗和祖國的叛徒。徹底肅清以龔品梅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不但能鞏固我們的人民民主政權，而且能保障廣大人民和愛國教徒的正当利益。只有把这些反革命分子从天主教內清洗乾淨，才能保持教會的純潔，才能使善良的愛國的天主教徒真正享受到宗教信仰的自由。我們每个愛國人民和教徒面臨着这样大膽的鬥爭，都應該站穩立場，分清敵我，堅決投入肅清一切暗藏在天主教內的反革命分子的鬥爭，來保衛我們祖國的社会主义建設事業。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日“解放日報”）

我做了一件應該做的事情

復旦中學初中本屆畢業生 潘書靈

潘開萊本來是我的哥哥，可是他暗地裏却在寫反動標語，印反動傳單，反對祖國，反對政府，反對愛國教徒，他不是我的哥哥，他是個反革命分子，我恨死他了。

那天中午，看到報紙上登出了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的罪行以後，潘開萊就咒罵政府。我聽到以後，就反對他，他又咒罵我“將來要入地獄”，我氣死了。下午三點鐘，他鬼鬼祟祟地在洗刷油印機，我想，他要印什麼呢？我就開始懷疑他，注意他。晚上八點鐘，他又在人力車燒什麼紙火，我對他的行動更加懷疑了。我又想到潘開萊平時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來往，行動也鬼鬼祟祟的，我想，潘開萊要是一個反革命分子怎麼辦呢？這時我又想到報紙上登出來的青年團員檢舉反革命父親的故事，想到

老師講的少先隊員捉特務的故事，想到輔導員對我們說的話：少先隊員要提高警惕。我不能放過他，我看到他在慌張地燒紙頭，我就衝上去從他手中搶奪還沒有燒毀的紙頭，但是他力氣大，我搶到紙頭後又被他奪過去了。我知道在他手裏難搶到東西，但我斷定他在燒反革命活動的材料，我就假裝去睡覺，却輕輕地從另外一個樓梯繞到客堂間去，果然我在檯子上發現了潘開萊放在那裏的一卷紙頭，我急忙把它塞進袋裏，立刻拿給姑母。姑母打開一看，果然都是潘開萊寫的反動標語。後來知道他已經察看好地形，準備張貼反動標語，散發反動傳單。他在燒的原來是一些印得不清楚的反動傳單。他還想消滅罪証呢！但是他來不及了，他已經被我和姑母揭發檢舉，終於被公安局依法逮捕了。

我是一個少先隊員，檢舉反革命分子，這是少先隊員的責任，我覺得我做了一件應該做的事情，我感到非常高興。

（一九五五年九月 四日“解放日報”）

不能容忍我姪子的反革命活動

存德小學 潘克球

昨天，解放日報登出了我檢舉醜品梅反革命集團的反革命分子潘開萊的罪惡活動的消息。潘開萊是我的嫡親姪子，我更不能容忍他反人民的罪惡活動。

九月九日，當我看到報上揭發了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醜品梅等的滔天罪行以後，感到無比的憤怒。我是一個愛國的天主教徒，對這批祖國的叛徒，我是十分痛恨的，我擁護政府這一賢明的措施。我知

道了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的滔天罪行以後，也想起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的許多罪惡，想起平時他們在教堂裏經常散佈反動言論，迫害愛國教友，迫害兒童，把教會弄得烏煙瘴氣，使我不能過正常的宗教生活，我感觸很痛心，我恨透了這批反革命分子。所以九日晚上，當我的姪女潘開萊把潘開萊寫的為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張目的反動傳單交給我以後，我氣憤極了，當時我一點也沒有考慮到他是我的姪子，我覺得他是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的一夥人，他是反革命分子，我痛恨他，我想立刻去報告派出所，但我又恐怕潘開萊逃跑，我就在家裏佈置不讓他跑掉，然後到派出所去檢舉了他的反革命罪行。當時，我一點也不猶豫，我覺得這是一個愛國的人民、愛國的天主教徒所應該做的事情。

潘開萊是一個十八歲的青年，他因為經常去听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講的反動言論，受了他們的欺騙蒙蔽，中了很深的毒，所以才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他變得完全和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一樣，常常咒罵政府，咒罵人民，他罵一切要求進步的人，他自己說，他恨新社會，恨一切人，甚至對我，對他的妹妹也恨之切骨。他所以變得這樣頑固反動，完全是受了龔品梅等這批反革命分子的毒害，想到這裏，我更加仇恨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他們毒害了多少青年啊！

今天我檢舉了反革命分子潘開萊，也正是挽救了他。我希望所有的愛國教友們，都勇敢地起來揭發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的罪行。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四日“解放日報”）

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是“法利賽人”的黨徒

天主教南京教區代總主教 李維光

九月八日上海市公安局破獲了暗藏在上海天主教內以龔品梅為首的反革命集團，並依法將反革命分子龔品梅、金魯賢、陳雲棠、李式玉、朱鴻聲、張希斌等逮捕法辦，對政府這一英明措施，我表示堅決擁護，並趁此發表一些個人的意見。

天主教的基本教義是敬主愛人，“十誡總歸二者上愛天主下愛眾人”，而愛人又是愛天主的具體表現。敬主而不愛人是虛妄的，天主是不接收這樣的敬禮的。愛人又包括熱愛和平、熱愛祖國、熱愛幸福美好的生活，一句話，在我們新中國，也就是要熱愛祖國的社會主義前途。而熱愛和平、熱愛祖國、熱愛祖國的社會主義前途，必須堅決反對戰爭，反對祖國的敵人，反對一切破壞我們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反革命分子。

自古以來，聖教會內的許多聖人賢人，為了人類的和平事業，為了人類的幸福生活，不知做出了多少努力與貢獻，但總是未能達到他們的願望。今天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領導我們走社會主義的道路，要把我國逐步建設成一個沒有階級剝削和壓迫的幸福美滿的社會，將幾千年來貧困落後的舊中國變為繁榮富強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從而使和平力量更加壯大，使帝國主義再也不敢發動侵略戰爭屠殺和平人民，造成人類的苦難與浩劫。所以實現社會主義是我們千百萬人民的共同理想，也是每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所熱烈期望的。若望聖經上說：“你們為什麼

只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照我的话行呢？”若望宗徒第二书信第二卷上也說：“如果有人說他認識耶穌，同時又不遵照他的誠命，這便是撒謊。真理並不住在他心裏。”這裏充分的說明了，任何一个光是口头上喊“主啊！主啊！”的，如果他不熱愛和平、熱愛祖國，不熱愛社会主义前途，他們便是違反天主的誠命，真理便不住在他們的心裏，他們也就不是基督的兄弟。至於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破壞和平、危害國家、破壞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反革命分子，就不單是祖國和人民的叛徒，同樣也是聖教會的敗類，天主的不肖子孫。而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正就是這樣的叛徒和敗類，也就是耶穌所攻擊和詛咒的法利賽人。

龔品梅反革命集團一貫仇視人民、仇視祖國、仇視社会主义事業。他們在帝國主义間諜特務分子指揮下，披着宗教外衣，利用“上海教區”機構為掩護，在全國各地搜集大批軍事、政治、經濟情報，報告帝國主义特務機關以及進行發展秘密“黨目”、散發反動傳單、陰謀暗殺軍政人員、奪取武器等活動，他們千方百計地迫害愛國的教友，特別是青年教友，他們公然誣毀社会主义生活是“貓狗生活”，誣毀總路線是“貓狗路線”……。這些嚴重的違反國法和違反教義教規的罪惡行為，凡是一個正直的中國人民，一個真心愛教的教友和神職人員，都應該引起深刻的仇恨，起來與他們作堅決無情的鬥爭。

自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的罪行在報紙上公布以後，廣大的愛國教友、神職人員以及各界人士莫不引起了極大的憤慨，並對政府逮捕法辦這些反革命分子的措施，表示堅決的擁護。這是每一個中國人民和愛國的天主教友所應有的正確態度。但是，目前在我們教會裏面，有一小部分教友和神職人員還存在一些糊塗的想法，在這裏，我覺得需要向他們說幾句話：

有人說：“龔品梅等雖然做了許多反革命的事情，但他們的出發點還是為了教會的。”顯然這種看法是不對的。從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的許多罪行裏可以看出，他們是帝國主義破壞我國建設的一個重要工具。他們的所作所為，絲毫不是為了教會。他們是按照帝國主義和蔣介石賣國集團的意圖去進行活動的，而不是按照天主的吩咐行事的。他們幹的許多反革命勾當，不但對教會沒有絲毫的好處，並且是完全違背了天主的旨意，使教會受了他們的玷污，使許多善良的教友在不知不覺中受了他們的欺騙和毒害，同時也破壞了教會在人民羣眾中的聲譽，嚴重地影響了聖教事業的廣揚。我們大家都知道，愛國和愛教是完全一致的，只有很好的愛國，才能很好的愛教，如認為龔品梅等幹反革命活動是為了教會的，不僅無此道理，而且也不符合事實。

有人說：“龔品梅雖然是反革命分子，但是他們是主教和神父，所以我們教友不能反對他們。”同樣這種看法也是錯誤的，這是沒有劃清反革命分子和人民的界限以及沒有劃清反革命問題和宗教問題的界限的表現。一個善良的主教和神父是不應該幹反革命活動的，因為這是天主所不喜歡的，是違反天主的旨意的。所以，對龔品梅等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我們就不應該再拿他們作主教、神父看待，更談不上什麼“愛”他們的問題了。那末我們正確的態度是什麼呢？就是要痛恨這些叛徒和敗類，檢舉揭發他們，把他們從教會內清除出去。我們這樣做是完全符合耶穌的聖訓和愛德的。因為，我們所反對的並不是什麼主教和神父，而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這兩者必須嚴格的區別開來。

還有些神職人員和教友雖然也認識到龔品梅等人是反革命分子，應該反對他們，對他們所下的反革命的命令，也認識到是不應當執行的。但是，他們卻又認為不執行這些反革命命令，似乎是違反了聖教會

的規矩。这样看法之所以不对，是由於他們沒有認識一切反对和平、反对祖國、反对社会主义事業的命令，是國法所不容的，是違反國家憲法的，而且也是違反聖教会一向嚴命教徒愛國的誠命的，因此，这种“命令”就是反对天主、反对教会的極大的罪惡命令。正义的天主是不容忍真理遭受摧殘的，这样罪惡的命令是無效的，不应当执行的，如果我們盲目地、錯誤地执行了这个罪惡的命令，那才是違反了天主的意思、違反了聖教会的規矩，在天主台前，那才是有罪的。

一切愛國愛教的神職人員和教友們，要積極响应政府的号召，參加到鬥爭中來，徹底肅清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消除暗藏在天主教內的一切反革命分子。過去因受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的欺騙而誤入歧途的神職人員和教友，應該認清政府“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者可以將功折罪，立大功者受獎”的政策，迅速選擇自己的出路，交代自己的問題，檢舉和揭發反革命分子。

親愛的神職人員和教友們！祖國和人民在熱情地期待著我們，全能、全善的天主在殷切地召喚著我們，讓我們高舉起愛國、愛教的旗幟，積極參加到反帝愛國的隊伍中來！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四日“解放日報”）

為純潔聖教会，把龔品梅等法利賽 黨徒清除出教会去

濟南教區副主教 董文隆

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是我們教会中的毒蛇，它不斷的向全國各地教友噴射他們的思想毒素，使各處傳教事業普遍地呈現了一種分裂、

癱瘓的狀態。解放以後，他們又組織一幫“公青”分子，派到各個教區，散發反動傳單，並造謠破壞說：“教難來臨”，所以有一些神父、教士改名換姓，拋棄了自己的工作轉入地下。有的雖然還在崗位上工作，但是抱着消極態度，等待着“變天”，這樣就把救靈事業拋棄到九霄雲外了。全國各地掀起了愛國運動以後，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在帝國主義的親自領導下，大肆造謠說：那個神父參加愛國運動，就是“跌倒”的神父，教友就當孤立他，不望他的彌撒。致使少數善良教友受了他們的蒙蔽欺騙而陷入思想苦悶和徬徨不安，這種現象為發展教務有莫大的障礙。人民政府在憲法上，明文規定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在城市，在鄉村也大力地貫徹了這一政策，使每一個教友都能過到真正的宗教生活，而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動輒不許愛國教友領聖體、辦神功，破壞教友宗教生活的就是這羣反革命分子。現在政府把這批人民的死敵和教會的敗類逮捕、法辦，不是罪有應得的嗎？所以我以無比愉快的心情，擁護政府這一英明的、及時的和必要的措施。

全國各地的教友和神職人員受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的欺騙而誤入歧途的，還大有人在。如今我誠懇的希望他們擦亮眼睛，揭開這些反革命分子所披的宗教外衣，看看他們那猙獰的面目和鉄一般的罪証，及早地醒悟過來，停止自己一切破壞祖國、破壞教會的罪惡活動，回到愛國愛教的立場上來，與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劃清敵我界限，爭取寬大處理，重新做人。

聖經上記載：“吾主耶穌把玷污聖殿的生意人赶了出去。”我希望愛國愛教的虔誠教友們，也要效法吾主耶穌這個精神，把潛藏在天主教內的反革命分子全部地清除出去。

我們廣大神父教友熱愛祖國

四川重慶教區代理主教 石明亮

我從親身經歷的事實中認識到只有肅清了隱藏在我們教會內的敗類——反革命分子，我們才能享受到真正自由的宗教生活。我回想起反革命分子董世祉受帝國主義指揮到重慶來破壞反帝愛國運動的時候，所謂“十人團”“致命隊”，整個教區被他反革命活動弄得惶惶不安，自從政府把反革命分子董世祉逮捕後，我們一直過着充分自由的宗教生活。我們有善良正直的意志和宗教良心，我們是神父，在信仰和道德問題上，絕對服從教會的最高權威；同時我們也是中國人民的一分子，我們熱愛祖國，我們堅決反對任何人利用教會來作仇視人民、背叛祖國的罪惡活動。我們神父們的使命是為了這個世界上的人民和平幸福，將來我們還要在天主台前對我們現世的行为作交代。

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的破獲，證明無論國內外任何反動勢力，都不能使我們廣大的天主教的神父和教友反對我們人民民主國家，反對社會主義。我們重慶的神父們和教友們聽到逮捕了龔品梅等這些叛教派的敗類以後，無不鼓舞稱快，在開會時，都忿恨地痛斥這些敗類的罪行，並保證我們全力擁護政府這一措施，一定要堅決將人跡清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及暗藏在天主教內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鬥爭，為保衛祖國純潔聖潔教會而奮鬥！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信鴿半月刊”）

愛國的大主教徒，積極投入鬥爭中來

天主教南京教區
無錫總鐸區總司鐸 康思誠

隱藏在上海天主教內以龔品梅為首的一批反革命分子，已於九月八日由政府依法逮捕了。我聽到這個消息並不驚奇，因為解放以來龔品梅反革命集團一貫堅持他們的反革命立場，始終與人民為敵，政府依法逮捕他們，是完全正當的、及時的。

一九五三年前，我對人民政府的認識還很膚淺，一九五三年以後，我認真地、毫無成見地開始研究了政府宗教政策和一般綱領，逐漸地、清楚地認識到：人民政府的唯一目標是要把我們的祖國建設成一個獨立、自由、民主、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首先自然要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打倒。新中國成立後，進行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等偉大運動，都是為建設社會主義掃清道路，而總路線、總任務就是引導我們走向社會主義的燈塔。凡是中國人民，不分種族、不分信仰，都應團結一致，為建設社會主義而努力奮鬥。

可是龔品梅反革命集團藉口信仰不同、主義不同，自始至終堅持反革命立場，反對共產黨、反對人民政府，反對共產黨採取的一切措施和一切改革運動。祖國自解放以來，僅僅六年時間，已在各方面取得了偉大成就；但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分子非但對這一切熟視無睹，而且蓄意破壞。至於社會秩序的改善，新道德的建立，煙、賭、娼妓、盜竊等等現象的基本絕跡，特別是幹部的廉潔奉公、忠心耿耿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更是

我們中國數千年來所未見的，也是我們宗教界人士所願意做而未曾做到的。可是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却仍詆之為假仁假義，騙騙老百姓而已！在他們的心目中，只要共產黨領導的都是不好的，只有帝國主義做出來的，才是好的。所以他們贊成細菌戰，稱頌原子彈，希望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祈求蔣匪幫復辟……。這種絕滅人性的一切想法和做法，不是基督精神，他們這些狂妄愚昧的政策，無法掩蓋他們反革命的猙獰面目。

至於人民政府的宗教政策，不但見於毛主席的言論，而且明白規定在人民憲法上。解放以來，人民政府從未禁止我們宗教界公開舉行宗教儀式，以及在教堂內宣傳教義教規，這完全是可以拿事實來證明的。愛教是我們信仰宗教的本分，反帝愛國是每個公民的責任，尤其是我們天主教受帝國主義影響很深，我們更應該起來反帝愛國。可是龔品梅反革命集團不但不參加反帝愛國運動，反而竭力摧殘這個運動。他們把教律的“禁阻條例”擴大範圍，威脅與迫害參加反帝愛國運動的教友，動不動“絕罰”停“聖事”。認為愛國就有罪，實在奇聞。我曾經質問過龔品梅：在“反帝”和“愛國”兩個詞的前面加個“不”字，不問在口頭上或良心上可以嗎？他在一九五五年一月間當了好多神職人員的面，說我這個質問“人傷他的心”！原來在他眼裏認為我愛了自己祖國也有罪了。我痛心我們教會內竟有這樣堅決地背叛祖國的反革命分子。

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是有計劃有組織的，他們的反革命活動不僅限於上海教區，同時始終沒有放鬆我們南京教區。一九五三年八月在南京教區神職人員集中南京學習反帝愛國道理以後，一致認為反帝愛國是天經地義的。可是會幾何時，由於龔品梅的直接干涉，以“摘神權”來威嚇，以致無錫總鐸區內有些神職人員就受其毒害，有的被被拉了過去，有的成為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的骨幹分子，像徐獻明、陸漱石等就是。徐

曾忠实地执行其反革命命令，称無錫为“瘟疫地带”。

我个人只有一颗火热的心，忠誠地热爱祖國、热爱教会。爱国爱教是一致的，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是一致的。思想和行动不一致是不行的，是非黑白一定要辨明的。反革命分子不管他们披着任何外衣，終究要被全國人民唾棄的，要被清除出去的。事实就是这样。我們應該百倍地警惕，提高思想覺悟，明辨是非。我們也要教育別人，再不要以为反帝爱国就是反教，我們應該站在爱国爱教的立場上，分清敌我界限，为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而鬥爭，这是我們全体宗教界人士的职责。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六日“解放日报”）

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在江西的罪惡活動

南昌天主堂本堂神父 孫耀漢

江西自一九五一年初，開展反帝爱国运动以來，工作經常受到阻碍。我們根据各方面的事实知道这种阻力是从龔品梅反革命集团來的。現在这个反革命集团已被破獲了，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首要分子“反帝”已依法逮捕了，这是給我們全國也是給我們江西的神長教友很大的一堆很大的絆脚石。因此我衷心感謝天主，感謝人民政府為我們留餘了一批害國害教的敗類。

現在我簡略地談一下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在江西的反動活動情况吧。

一九五一年元月份，南昌市的神長修女教友共九百餘人，發表了一個宣言，當時江西全省的幾位主教，对这个宣言都認為“可以”，“並沒有

什麼反對信仰的危險”。但自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寄來了種種反動文件以後，於是南昌市的反帝愛國運動就遭到了“聖母軍”分子的瘋狂破壞。

一九五二年六月份，南昌市天主教反帝愛國委員會正式成立不久，我的思想剛才搞通，那時就有人從浙江寄信來勸我不要那麼積極，要我去上海“學乖”，當然這些舉動都是出自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的指使。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份，江西省宗教事務處在南昌市召開全省宗教界代表會議，有的接到通知時本不願意來參加，後經龔品梅指示才來了南昌，他們來的本意，原是來看風勢，隨時要起些破壞作用的，但來後，看見各方面都很好，於是在十天會議將結束時也舉手通過了決議，但回本教區後，受到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的影響，又恢復了舊觀，變成了決而不行！

一九五四年八月份，湖南及江西餘江幾個教區的神長及教友代表來南昌訪問，結果大家對南昌市幾年來進行的反帝愛國運動印象很好，只因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從中挑撥，以致江西的神長教友不能團結一致，反而有少數的神長教友猖狂地反抗政府，污蔑共產黨，歪曲宗教政策，破壞反帝愛國運動。

一九五四年十月份及十一月份，江西全省各教區的七十三位神長，集中在南昌市學習政治時事及宗教政策，學習期間，最顯明的出現了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在江西的罪惡活動勢力。例如：有的在發言中，常是開口“上海”，閉口“上海”，以前我莫明其妙，現在我完全明白了，原來他們受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的指使，在江西做龔品梅的代理人，執行反革命使命的。

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經常寄反動的宣傳文件來江西，造謠惑眾，使部分神長教友反抗政府，挑撥神長與教友以及神長、教友與政府之間的團結。

上海有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在宣傳三次大戰的來臨，原子彈的威力等等荒謬謠言，南昌市有同樣的宣傳及謠言，反革命分子鄧擇中拒絕簽名反對使用原子武器，就是一個實例。

用鈔票來收買個別神長修女教友，他們中有人直認不諱：款項是從龔品梅反革命集團來的。

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在江西的罪惡活動事實多得很，只就一九五五年中所散播的謠言，所做的反革命活動，如果簡單地寫上來也有一本很厚的小冊子。

最後我誠懇地希望受了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影響的神長修女教友，必須擦亮眼睛，看清問題，劃明敵我界限，及早跳出反革命集團的火坑，重新做人，積極參加到愛國運動的行列中來，同人民一道和反革命集團作無情的鬥爭，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信鴿半月刊”）

堅持愛國愛教立場，徹底清除 暗藏在天主教內的敗類

天主教南京教區石鼓路本堂 楊鄰德

九月八日上海市公安局破獲了暗藏在上海天主教內的以龔品梅為首的反革命集團，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已經依法逮捕。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解除了我數年來對教會前途憂慮的心情和我內心久懸的疑雲。事實證明：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披着宗教的外衣，暗裏却勾結帝國主義和蔣介石賣國集團，進行着叛國害教的勾當。根據報紙上初步公佈的材料來看，他們長期來一貫地、系統地、有計劃地破壞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他們既不是偶然的犯罪行為，更不是什麼思想問題和宗教問題，而已經成

为忠心为美帝国主义和蒋匪帮服务的工具；是披着羊皮躲在天主教内吃羊的豺狼。我对政府这一正确、及时、贤明的措施衷心表示感激和热烈的拥护；并要求政府对这一批反革命分子予以应得的处分。

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坚决对抗政府，敌视人民，早在一九五一年苛就给我看出来了。那时，龔品梅就已立下了“遗嘱”，交给他的亲属和上海耶稣会。他的年龄并不老，体力又不弱，为什么要写遗嘱呢？这是不是当了主教后所必需有的手续呢？绝对不是的。这件事本身就已充分说明：从龔品梅当上上海教区“主教”的第一天起，就已决心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甘愿为美帝国主义和蒋匪帮卖命。

龔品梅反革命集团不论在教堂内外，不论在公开场合或私人谈话中，以及所写的文告、所编的歌曲和经文上，都充满了“魔鬼”、“死亡”、“教难”、“致命”的言词。对新中国的时代说成是“大难临头”、“地狱翻形”、“水深火热”、“涕泣之谷”……。总之，用尽辱骂与诋毁、仇视与抗拒的言语，来在教友中制造恐怖、疑懼，从而使教友们也仇视和反对我们自己的政府。

解放后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一切建设事业蓬勃發展，代表着全世界人民真实意志的和平力量一天比一天地壮大着，包括真正的爱教爱教的天主教教友在内的全中国六亿人民，无不欢欣鼓舞，为祖国无限幸福美好的前途而慶幸，在我们天主教内，却尚有一小撮人仍在对祖国和人民仇恨、咒骂、对抗，他们的用心何在？世界和平原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珍品：Pacem relinquo vobis, Pacem meam do vobis, 我留给你们平安，我把我的和平赏给你们。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繁荣富强，原也是我们教会的切望：Ut fructus terrae dare et conservare digneris, te rogamus audi nos! 求賜生存大地百穀，主，俯听我等！聖教會所我們这

样祈禱，为的是能更好地安心事主：“庶不慮肉身之需，專務神功，一心事主”。我們國家的總路綫是要把我們祖國引向和平、自由、幸福、繁榮的生活，所以六億人民都一心一意地團結在自己政府的週圍辛勤努力，这原也是符合天主聖意的；难道不是在天主罰元祖背命時對他們所說的今後應該从出汗流血的勞動中爭取生存的意义嗎？我們有了親如父母的政府，只有帝國主義和蔣匪幫才不甘心自己的死亡，还在作垂死的掙扎。过去隱藏在教會內的帝國主義分子黎培里、田望霖、林仁、翟光華、格寿平等，由於犯了企圖顛覆我們的政府的罪行，已受到國法的制裁，並激起了所有善良的愛國愛教的教友們和全國人民的憤怒，而魏品梅反革命集團竟敢死心塌地地充當他們的代理人，幫他們的主子來繼續危害祖國和人民，玷污我們的聖教會，尤其是对真正支持正義、忠於祖國、忠於教會的愛國神職人員和教友們，進行橫蠻的攻擊和迫害，如果我們還默不作聲，繼續容忍下去，那還像一個什麼教會呢？耶穌在白路撒冷責斥在聖殿中做買賣的商人們說：“我的屋子是朝拜天主的地方，你們把这祈禱場所變成了賊窩！”隨後用鞭子把侮辱聖殿的商人們赶了出去，又推翻了他們的帳檯，踢散了他們的商品。耶穌这样做，難道是做錯了嗎？不是的，耶穌这样做正是給我們留下了一個絕無二、真正愛教的榜樣，好教我們當有人利用教會、玷污教會時，有勇氣堅持正義行動，給這些人以無情的打擊，以純潔教會和光榮天主。

政府一再地告訴我們：保護宗教信仰自由絕不等於可以保護反革命活動的自由；而鎮壓反革命也絕不等於反對宗教。恰恰相反，鎮壓隱藏在教會內的反革命分子，也正是為了貫徹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保護正當的宗教活動。凡是愛國愛教的神職人員和教友們，在反帝愛國、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鬥爭中，不要徘徊觀望，心存疑慮，而立

当从肅清以龔品梅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鬥爭中提高覺悟，擦亮眼睛，拿出自己的良心來，遵循耶穌基督的教訓，以和平、祝善、愛主、愛人的精神，投向人民的懷抱，站穩符合天主聖意的愛國愛教立場，為建設祖國而共同奮鬥，為純潔教會而共同努力。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四日“解放日報”）

揭發龔品梅指使我破壞反帝愛國運動的罪行

天主教南京教區丹陽花家渡本堂神甫 崔學孟

九月八日上海市公安機關破獲了暗藏在上海天主教內的以龔品梅为首的反革命集團，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已經被依法逮捕。我完全擁護政府這一英明的措施。

龔品梅反革命集團秉承帝國主義的意旨，千方百計地進行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罪惡活動。他們嚴重地毒害了不少天主教神職人員和教友，使這些神職人員和教友成為他們的幫兇。我就是其中受毒害很深的的一個。

現在我要揭發反革命首惡龔品梅破壞天主教愛國教友反帝愛國運動並利用我進行破壞活動的嚴重罪行。

一九五三年我參加了反帝愛國的學習，並對人民政府逮捕帝國主義間諜田望霖、林仁等措施，用書面表示了完全擁護的態度。但反革命分子龔品梅卻對我這一反帝愛國行動極端仇視，竭力加以阻撓破壞。一九五四年春，他通知我去上海作補贖，我因為沒有站穩愛國立場，就對他屈服了。到上海以後，他叫我作公堂補贖，叫我承認參加反帝愛國運動是錯了，並叫我推翻在報紙上所表示的擁護政府逮捕帝國主義間諜田望霖、林仁等的態度。在我作了公堂補贖以後，他指使我：一、今後不

能去南京參加反帝愛國的學習會；二、不得接受天主教南京教區所給的生活費；三、愛國教友的報紙刊物都不得讀；四、不能給參加青年團、少先隊的教友辦神功、領聖體；五、不能參加愛國會，因為這是“非法”的；六、叫我在本地教友面前再去作補贖；七、他還命令我與別的神甫帶信，叫他們也來上海作補贖，以達到他爭取人、聯絡人的罪惡目的。最後，我向他要反革命活動經費時，他就給了我五十台彌撒（舊幣一百萬元）。

在龔品梅的威脅利誘下，我接受了他的破壞反帝愛國運動、包庇帝國主義分子的反革命命令，做了他的幫兇。我在回丹陽花家渡的途中，就開始了反革命活動：到常州、奔牛、丹陽等地傳信給三位神甫，要他們到上海去作補贖。我回到花家渡以後，在本地教友面前作了公堂補贖，並且徹底推翻了過去一切愛國行動和在學習會上所作的反帝愛國的表示。除此以外，我還做了許多更加嚴重的对不起祖國，对不起人民的事情，現在回憶起來仍然是十分難過和不安。當時我曾向教友宣佈，凡是參加青年團和參加少先隊的，一律停止辦神功、領聖體。我從胸前摘下了參加愛國活動的紀念章，並且猖狂地從牆上把毛主席的像拿下來用火焚掉。我還在教友面前公開散佈“現在宗教信仰自由是假的”等污蔑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反動言論。這時，我所說的話和所做的事，完全是在忠实地執行着反革命首惡龔品梅的反動“指示”，這些言論和行為已經完全不是一個神甫所應進行的正當的宗教活動，而是龔品梅威脅利誘我幹的反革命勾當。

人民政府為了教育我、挽救我，曾派人和我談話。起初，我的態度還是十分惡劣，並且在政府幹部面前再一次推翻以前在學習會上所作的各種反帝愛國表示，我頑固地說：“我就是如此，政府看怎樣就怎樣吧！”上海的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分子看到我這種態度，非常高興，無恥地寫信叫我“勇敢”、“不要害怕”，要我“準備為天主致命”，也就是要我死心塌

地与人民政府为敌到底、与人民为敌到底。一直到一九五四年四月底，我勉强到南京的時候，还抱着非常恶劣的态度。现在我回想起来，我从参加反帝爱国运动转变到破坏反帝爱国运动，这都是反革命首恶龔品梅对我的威脅利誘和毒害的结果，使我誤入歧途，作出种种反人民、反革命的罪恶活动。幸亏人民政府苦口婆心地再三对我教育说服，才把我从反革命的泥淖中拯救出来，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在此我深深地感谢人民政府的爱护，並祈求祖国人民的宽恕。同时，我还要跟这喪天害理的、披着“主教”外衣的反革命首恶龔品梅算賬。

最後，我希望所有受过龔品梅反革命集团毒害过的神職人員和教友，都能站起來揭發、控訴、檢舉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劃清敵我界限，站穩愛國立場，在全國人民支持下，共同為肅清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及一切暗藏在天主教內的反革命分子而鬥爭！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七日“解放日報”）

龔品梅是反帝愛國運動的死敵

天主教南京教區常州市本堂神甫 李玉符

暗藏在上海天主教內的龔品梅反革命集团已被上海市公安機關破獲，龔品梅等反革命分子已被逮捕。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各地愛國神甫和教友們，都是額手稱慶。

龔品梅竊據神職，千方百計地阻撓愛國愛教的教友們和神甫們參加反帝愛國運動，妄想使教友們和神甫們同他一樣去出賣祖國和出賣教會，作帝國主義的走狗。

我自參加了反帝愛國運動後，反革命分子龔品梅就專門派人把我叫到上海，橫暴地威脅我說：“我告訴你，反帝就是反教，參加反帝愛國

運動，就要受棄絕。”又說：“你已參加了反帝愛國運動，該做補贖，回到常州以後，應該在聖堂裏向教友公開承認自己以往是錯誤的，今後要糾正錯誤，不再參加反帝愛國運動。”請看，龔品梅這個祖國叛徒、教會敗類的帝國主義奴才相是多麼露骨呀！他說的這些話不僅完全失去了一個中國人的立場，而且完全違背了天主的誡命，十足暴露了他是一個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他的眼裏沒有祖國、沒有教會，而只有他的帝國主義主子。他沒有想到祖國的利益和愛護聖教會，而只是想着帝國主義和蔣介石賣國集團的血腥統治的復辟。特別值得引起嚴重警惕的是，他這一系列背叛祖國、反對革命的罪行，是用宗教作為掩護的，譬如他散佈什麼“反帝就是反教”“參加反帝愛國運動就要受棄絕”等論調就是利用教友的虔誠，打着為了教會的招牌，來欺騙教友，為他的帝國主義主子効忠。誰都知道：愛國愛教是完全一致的，參加反帝愛國運動不僅是為了保衛祖國的利益，也是純潔教會所必要的。但是龔品梅偏偏顛倒是非黑白，這就說明他是徹頭徹尾的反帝愛國運動的死敵。記得我當時曾對他提出不同的意見，他講不出道理，就濫用神權威脅我說：“任何理由都不行，我就不准參加反帝愛國運動。”

沒有什麼可以懷疑的了。龔品梅反革命集團不是什麼主教、神甫，他們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他們不是在傳教，而是在進行以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根本目的的罪惡活動。但是，如同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可恥下場一樣，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同樣逃不出人民的法網。

通過龔品梅反革命集團事件的教訓，我要更積極地參加反帝愛國運動，和教友們、神甫們一道，在廣大人民的支持下，堅決肅清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徹底清除暗藏在天主教內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盡一個祖國公民應盡的責任和聖教會神職人員的本分。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六日“解放日報”）